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推荐的故事

黑手高悬霸主鞭

第五册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

长征纪念碑为何定址于川主寺

一进入松潘境内，人们就被壮丽的山川、秀丽的景色所吸引，还有那少数民族的村寨彩旗招展，分外夺目。从黄龙寺翻越雪宝顶，极目远望，红军亭、红军牌坊、红军纪念碑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使风光如画的大地，更加迷人，精神振奋。到了这样的环境，高山反应给人们带来的身体不适，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

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下行，在峡谷口，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映入眼帘。随着车轮的转动，这座建筑逐渐清晰，高矗的纪念碑上书写着“红军长征纪念碑”。红军战士身背斗笠，扛着步枪，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在长征路上的塑像，炯炯有神，充满胜利的信心。

纪念碑附近建有纪念馆，陈列着红军的战绩和感人事迹。从纪念碑向北，紧挨着川主寺，这是一个高原集镇，居住着藏、汉等多民族人民。从建筑风格、生活习惯上看，充满藏民族的生动气息。再往西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虽说是一马平川，海拔高却在 3000 米左右，这里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很难看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物质文明”，在自然条件方面充满“原始”气味。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分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出发，红二、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西出发，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区，而后再向川北前进，三支红军长征足迹遍及 14 个省，走了半个中国，完全有条件把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便于人们参观、瞻仰的地方,为什么却偏偏要建在进出交通不便利,人烟稀少的高原小镇呢？

这里虽然是从成都出发，到世界著名风景区的九寨沟、黄龙寺的交通要冲，也靠近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附近也有著名的水晶石产地，但是这些都不是建设红军长征纪念碑的依据。

建纪念碑，当然是要建在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红军的足迹遍布那么广，哪里最有意义呢？

专家和决策者们经过潜心研究，反复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从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算起，到 1936 年 10 月长征结束共 24 个多月，可是红军在四川辗转战斗活动却达 20 个月，占长征总时间的六分之五左右，在四川的 100 多个县中红军的战斗足迹遍及 73 个县、市，约 30 万平方公里土地，进行大小战斗 100 多次。长征中最艰难的阶段——翻雪山、过草地、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惊心动魄的业绩都发生在四川境内。

为什么在四川那么多的县市中又选中松潘呢？因为三支红军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时间出发，而松潘却是三个方面军都到过的地方，红军还在这个县建立过革命政权，具有代表意义。

为什么不把纪念碑建在松潘县城，而要建在川主寺呢？那是因为川主寺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它是红军路上的要冲。长征中中央曾在川主寺以西的毛儿盖举行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毛儿盖会议。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同志过草地时就是从川主寺后山的尕力台经过的。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通往松潘、九寨沟、黄龙寺等风景区的宽阔的柏油路，把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川主寺，一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二是也便于中外游人参观长征的光辉业绩。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才批准了把红军长征纪念碑建

在川主寺。如今已使不少的人受到教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于 10 月间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并亲自飞赴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 12 月 4 日，蒋介石准备就绪，再度来到西安，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逼迫他们表明态度：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向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果张、杨不愿打内战，立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给中央军。

这个办法，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深知，受了红军影响的广大官兵是不会再听蒋介石驱使“剿共”的，何况他们本人也不愿继续打内战。如果走第二条道路，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两军再分开，结果必将为蒋介石分别击破，无疑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再没有路可走了。

张学良按照和杨虎城既定的决策和步骤，第一步先向蒋介石实行“善说”。 12 月 7 日，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说服蒋介石。他先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继则同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历 3 小时之久。蒋介石厉声斥骂他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按照预定的第二个步骤实行“兵谏”。他们决定：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由东北军担任；十七路军则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的武装，控制飞机场和火车站。部署大体就绪后，具体的行动时间还未决定。

12 月 9 日，西安 1 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 1 周年，举行了示威大游行，要求团结抗日。当游行队伍集合时，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了一个 12 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整队冲出中山门向华清池进发，去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消息，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令他用武力制止，“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乘汽车赶上请愿的群众，进行劝阻，说他们去见蒋介石，将有牺牲流血的危险。有一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慷慨激昂地说：“张将军，东北沦亡 5 年啦，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流血，愿为救国而死！”说罢放声大哭。接着 1 万多人都放声痛哭起来。悲痛之声，震动山河。张学良爱国之心，受到激发，他挥去脸上的热泪，激动地对群众说：“同胞们，我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

果然，到了第 3 天，张学良就以非常举动实践了他的诺言。 12 月 11 日午夜 12 时，张学良召集他的亲信，宣布实行“兵谏”的决心和行动计划。当时曾有人提出捉住蒋介石第二步怎么办？怎么处置蒋介石？张学良答复：

“第二步怎么办？捉住以后再说。只要他（指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这说明，当时张学良虽然没有完整的第二步行动计划，但只要蒋答应抗日，张学良仍拥蒋，事件就可以和平解决。张学良宣布完行动计划后，随即率领他们前往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设立临时指挥部，与杨虎城共同指挥这一行动。他们还指定几个人草拟了一份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稿，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计划通电稿捉蒋以后发出。

12 日清晨 5 时，白凤翔、孙铭久等带了一个连警卫，乘车赶到华清池。经过一场激战，他们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并在山上一块大石头后面草丛里捉住了蒋介石。蒋介石还被扣于临潼，尚未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时，张学良就明确地对杨虎城说：“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张学良是倡导和解、决定放蒋的第一人。

把蒋介石拘禁起来以后，张、杨便立即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八项主张的通电，同时打电报通知陕北红军，请红军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他们还令一部分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一切政治方面的问题；令一部分高级武职军官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

当天下午设计委员会就成立起来，并讨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第二步怎么办？怎样处置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张学良虽然有和解想法，但张、杨当时并无成竹在胸。设计委员会在讨论时，也都提不出成熟的意见。有人主张杀蒋；有人主张送交红军去杀；也有人根据张学良的说法，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释放他。讨论到最后，大家认为这个问题重大，既然我们没有成熟的主张，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我们高明，不如等红军代表团来到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

第二步怎么办？虽然大家还捉摸不定。但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应该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不论上下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理所当然的结局。设计委员会并向西安各界和军官作了这样的宣传，得到群众和军官们的一致拥护。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竭力主张先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进行“讨伐”。各地方实力派系头目也因自身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其中，冯玉祥于 13 日致电张学良提出“请先释放介公回京”的和平主张。

中共于 13 日知道蒋介石被扣消息，毛泽东主席立即召开中央会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因为这一事变采取了军事手段，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位置，而造成了对民族存亡有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事变的前途，英明地决定了党的基本方

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破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同情张、杨并给予积极的援助，切实作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现在全国主要的地区和军事力量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应该设法运用这个力量去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局势，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后，就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率代表团赴西安。12 月 15 日和 19 日，党中央又先后两次通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同时集中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准备与张、杨部队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于 16 日乘张学良派来迎接的飞机抵西安，经过周恩来向各方面耐心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5 日，蒋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天下事难不倒红军

1936 年，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到达陕甘后，一部又西进河西走廊，真是吃尽了苦头。11 月红军在对敌战斗中，由于敌情、地形不熟以及缺乏对敌骑兵作战的经验等种种原因，部队古浪战斗失利，水泉伏击战未达目的，虽歼敌数千人，红军亦伤亡严重。后又激战梨园口，红军弹尽粮绝，损失惨重，部队被敌人打散，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带领十几个人突围，转移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山森林中。当时除了躲避敌军搜山，防止遭到袭击外，最大的困难就是国民党军队封山围困，部队找不到粮食，没有吃的，随时有被饥饿夺去生命的危险。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王树声坚定地鼓励大家：“天下事难不倒红军！今天我们暂时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十几个人一条心，团结战斗，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走出祁连山。”接着他又乐观、自信地说：“同志们，你们看，这漫山冰雪，满地野菜，这高高密林，丛丛野草，吃的、喝的、睡的，大自然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困不死我们，更饿不死我们！只要坚持、忍耐，我们一定能生存下去，一定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关心体贴，保护好身体，为革命多保留一颗种子。记住：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人在，革命的种子是不会绝的！”他的一席话，犹如一盏明灯，把大家的心照亮了，红军战士团结更紧、意志更坚、力量更大了。

十几个人在王树声的带领下，忍着饥寒交迫，顽强地坚持在丛林深处。一天，王树声突然想起了爬山时从望远镜里观察到的山下河边有淘金游民活动。于是，他决定立即下一次山，冒次险，向这些游民买点粮食，来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到了傍晚，他们悄悄地摸到山下，突然出现在草棚里的游民面前。

“我们都是穷苦汉子，没什么值钱的，求老总开恩放过我们吧！”一个年长的游民认为碰上了兵匪强盗，吓得跪地求饶。

“老乡，别害怕，我们不叫老总，也不是坏人，我们是……”还没等王树声军长说完，也没听清王树声说了些什么，慌恐中的游民又一个劲地磕头求饶：“老总，我们四海为家，天当屋，地当床，实在是一无所有呀！求求您大发慈悲，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王树声十分同情地看着这个吃尽了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苦头的老人，看着这种情境，王树声这位南征北战的汉子，也不免有些鼻子发酸了。他俯身双手将老人扶起，然后和蔼地解释道：老乡，我们是革命红军，是专替穷人闹翻身、谋幸福的人民子弟兵。按你们说的是“替天行道”的绿林汉子。红军和专门杀人放火的国民党、马匪的军队不一样，对我们穷人不偷不抢，不打不杀。接着，他边把自己手中的驳壳枪往老人怀里放，边笑着说：这个东西是专打日本鬼子，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来，拿着这家伙，我再和你叙谈叙谈。

亲切的话语，诚恳的态度，使老人渐渐地消除了心里的恐惧和疑虑。又过了一会，王树声才向老人讲明了来意。老人很同情红军的处境，当场就叫同伴们取出了粮食，分给红军战士们。

返回的路上，王树声见同志们扛着搞到的粮食，个个都很高兴，自己也笑了。他便进一步鼓舞大家说：同志们，干革命就要像这些淘金者一样，有一股吃尽艰辛、百折不回的淘金精神，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强者！同志们听了，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一次意外的袭击

1936 年底，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红 9 军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勇猛作风，一路西进，一路战斗。在河西走廊战永昌、打山丹，转战西洞堡、龙首堡，血战仉家营子，最后掩护西路军向祁连山转移时，又激战梨园口。梨园口之战，红 9 军全体指战员奋力冲杀，肉搏苦战，给敌以严重杀伤，但红军伤亡亦大，蒙受重大损失，最后部队让敌人给打散。王树声带着十几个人杀出一条血路，率队进入祁连山原始森林。

当时除了躲避敌军的搜山和意外袭击之外，缺粮少药，受冻挨饿也是主要的问题，再加上当地回民群众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同时反动派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群众对红军抱着戒备心理和敌视态度，甚至还不时用跟踪、设伏等方式，对红军进行袭击和骚扰。一时间，王树声和所带同志们，行动非常艰苦，生活非常困难。

一天中午，正当红军战士快把花了一上午时间和体力才采集的野菜煮熟时，突然从林子里飞过来一片雨点般的石头、瓦片，当即砸翻了煮菜的锅，不少人身上也挨了石击。这意外的袭击，不仅把红军战士辛辛苦苦准备的一顿“饭”给报销了，而且身上还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心中难免燃起了一股难忍的怒气，个别同志叫着要冲过去教训回族人一顿。

王树声见状，冷静地叫住大家，心情百感交集，他既爱护和心疼红军战士，又理解群众的心情，王树声沉默了一会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说说，我们是谁？是强盗？是土匪？是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兵痞？不是！我们是有高度觉悟的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是替穷人求解放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

兵，回族人民也是穷苦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天下穷人是一家嘛，一家人怎能自相残杀呢？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只有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才能做得出来，眼下这些回人打我们，是因为他们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受了回族人民中的反动分子马步芳的愚弄挑拨，这要归罪于蒋马之流反动派！我们的仇恨只能往他们的身上发！枪口应对准他们才对！”

大家被副总指挥的道理说服了，心中的怨气也就消了。事实也教育了回族群众，他们见红军打不还手，秋毫不犯，是少有的仁义之师，对他们的态度也就改变了。

周恩来劳山历险

历史上，著名人物，特别是杰出的军事人物，多有大难不死、化险为夷的不平凡的经历。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0 年 1 月， 22 岁的周恩来，曾同国人一起反对北洋政府准备同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由日中“直接交涉”，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遭到官方拘捕和审讯，经多方斗争获释。1925 年 6 月，周恩来率领党军两个营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营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游行示威，队伍途经沙基时，在沙基的英帝国主义军警悍然向游行队伍开枪，与周恩来挽臂而行的同志，左右两人都饮弹身亡，而他却安然无恙。随后，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临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遭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急打方向盘躲闪，结果子弹连续击中司机的头部，他又一次幸免于难。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 6 架飞机突然临空投弹，周恩来闻声大叫“卧倒”，并飞身扑向 18 岁的肖华把其压在身下，接着一声巨响，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尘土落满了他们全身，他又一次平安度过。据周恩来身边同志回忆，类似上述出生入死的事例，周恩来竟经历过 22 次。其中的劳山历险，便是最惊险的一幕。

1937 年 4 月 25 日，一辆军用敞篷汽车从延安城南门开出，驶向通往西安的山路。驾驶楼里，坐着神情自若的周恩来副主席。昨日他同毛泽东主席谈了一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尔后还要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一路车轮飞驰，黄尘滚滚，洋溢着欢声笑语。车上有代表团成员张云逸、孔石泉；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连同警卫战士、记者、翻译共 25 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久经沙场的将士，但坐汽车上省城，有的还是生平第一次，焉能不心驰神往，谈笑风生。

这时，陕甘宁原有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苏区范围北起长城，南达淳化，西界固原，东濒黄河，全区连成一片，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不久即改称陕甘宁特别行政区，下辖 36 个县和神府特别区。由于苏区迅速恢复扩大，未来得及巩固，残留在苏区内的民团、地主武装、散兵游勇、地痞惯匪和叛变投敌分子等，形成 43 股数量不等的土匪武装，他们经常为非作歹，袭扰苏区人民，破坏生产建设，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还有少数土匪受国民党特务的唆使和支持，破坏苏区交通，袭击、暗杀共产党干部和红军人员。在这些股匪中，其人数最多、危害最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幼舞枪弄棒，打架斗殴，长大后当上土匪的小头目。1935 年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红军独立营，李清伍任教导员。他恶习不改，不务正业，只知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红军之机，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杀害，同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互相勾结，重操旧业，四出杀人越货，为害乡里。他接到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的密报后，便率领 100 多名土匪连夜翻山越岭，在劳山设伏，准备袭击红军的军车，目的是抢劫财物。

劳山自西向东，将延安和甘泉两县隔开，属黄龙山的支脉。在黄土高原沟壑丘陵起伏的地形中，它虽不算高峻，但由于深沟纵横，梢林荒草遍地，便显得异常显赫。卡车吼叫着，沿着劳山北坡路，吃力地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山梁就到了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簸箕状的山凹凹里。

突然“砰！”一声清脆的炸响，在山谷里引起阵阵回声。

“什么声音？”陈友才出于职业习惯，本能地掏出手枪。

“好像是甩皮鞭子。”刘久洲向外张望着说。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 10 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原来那“砰”的一响，惊动了周恩来，他意识到情况异常，且山凹凹是块险地，于是他一边观察，一边命令司机：“冲，加大油门，冲上坝梁！”

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枪响。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便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喷着黑烟，喘着粗气，直冲大坝梁。

岂料，坝梁上忽然像炸爆豆一样噼里啪啦响了起来，埋伏在山梁上的土匪，步枪机枪同时开火，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位上，浑身鲜血直流，卡车轮胎也被打破了，车头一歪，停在了山梁下。

几乎是在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飞身从汽车上跳下来。车前玻璃被子弹打坏，但却未伤周恩来一点皮毛。他身贴车头，急令车上人：“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副队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袭击。陈友才还未来得及跳下汽车，腿部已经中弹。警卫员转身要扶他，他将手臂猛力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快撤！”

陈友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被敌人认为是个大官，因此马上吸引了一阵密集的火力。陈友才为了吸引更多的敌人，利用汽车作掩护，与敌人展开对射。

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迅速看清了地形，山凹谷地中间是个潭，潭左边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土山包；潭右边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林后是条深沟。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有敌人埋伏；右侧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很可能是土匪武装。那么土匪所关注的目标自然是财物，不是车上的人员。因此梢林后的沟里可能不会有伏兵。

周恩来在刹那间已经定下决心：“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的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茂密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

这次伏击的。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入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叫：“看，那几个人要跑！”

“嗯！”李清伍鼻子里喷着一股气息，“早就看见了。”

“那就快追吧！”

“追他干甚！”李清伍白了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金钱细软全在车上呢！”

周恩来等人进入树林后，虽然枪声仍然不断，打得树木枝叶脱落，但这种乱枪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已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息稍走，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破一点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顺沟转过几个山包，发现前边是两丈多高的土崖，两边是悬崖峭壁。警卫员见状，急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轻松的语气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焦急情绪，战士曹鸿都望着低垂的树梢，心有所动，便紧跑几步纵身一跃，抓住树枝，顺势荡去，脚在悬崖上猛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登上悬崖，他迅速解下绑腿，把崖下的人一个个拽到悬崖上。

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山下枪响的方向，久久没有说话。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人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同敌人周旋，战斗到最后一息。

这次历险，红军牺牲了 11 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土匪门冲下山梁一窝蜂拥上卡车时，不禁大失所望。车上既无金银财宝，也无大烟土及绫繹绸缎。他们不甘心一无所获便去搜查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到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到西安联络工作而装在身上的，那上面印着周恩来……

李清伍一听到这三个字，立刻脸色全白了，惊叫着：“啊呀，坏了！桶下大乱子了！快，快跑！”霎时，这群土匪成了鸟兽散。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全部被红军剿灭。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传到了延安。于是，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赶赴出事地点。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望着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张云逸流下了痛惜的热泪。

周恩来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又启程赶赴延安。临行前，他匆匆跑到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他的贴身警卫刘久洲泪流满面地哭着说：“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周恩来动情地说。

1969 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 多年一晃眼。30 多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之事，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保存下来。周恩来十分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 年　6 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湫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竖立了一块石碑，算是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一桩心愿。周总理如

果地下有知，定会赞扬甘泉县人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好！

红军延南剿匪

王平在红军大学毕业时，校长林彪找其谈话说，过去对红三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接触，觉得红三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林彪想让王平回红 4 师当政委，王平说在那个部队太久了，能分到一个新单位，在新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更好。林彪表示同意。中央军委确定杨勇去红 4 师当政委，王平到陕北红 27 军当政委，贺晋年当军长。

1936 年 12 月下旬，王平与贺晋年一起去见毛泽东主席。王平对毛泽东主席说，他要改名，不叫王明，张爱萍已为他想好了新的名字叫王平。这是王平第二次改名了。他原名叫王惟允，1930 年王参军后，连长点名时，用广东腔喊他的名字，总是叫“王翁翁”，引得大家忍俊不禁，于是连长就同他商量，改名为王明。那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未上台，多数人也不知道王明其人。

毛泽东主席风趣而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个，别人才拿我开玩笑。”“那好吧。”毛泽东主席说罢，当即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命令贺晋年任 27 军军长，王平任 27 军政委。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命令，王平视为珍宝，一直保存着，后来在河北过唐河时，突然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他甚为惋惜。

王平与贺晋年到红 27 军赴任，顺路到了延安。这时，延安刚解放，江华任延安警备司令。他们在延安住了两天，便前往延安以南 20 多里的红 27 军军部，在军部过的 1937 年元旦。

1 月初，为支援东北军、西北军对付何应钦的“讨逆军”，红 27 军奉命开到澄城、白水一线，归红二方面军指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的内战没有打起来，红 27 军撤回洛川。1 月中旬，党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红 27 军负责维持西安到延安的运输线。那时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过往的人很多，部队负责这些人的食宿。洛川是边区南部的前沿，基本上是国民党统治区，专员和县长都是国民党的人员。红军要在此站住脚，首先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红军常同国民党军开联欢会，当地人民群众前来看热闹。国民党军着装整齐，红军穿的是破衣败絮。但是国民党军队出不了什么节目，红军却很活跃，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会。所以当地老百姓动情地说：“国民党军队中看不中用，共产党军队中用不中看”。

那时，宜川、延长、富县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无人区，方圆有二三百公里，后来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首先在这一带的南泥湾搞起来的。东北军有一股散兵游勇跑到这里当土匪，陕北一个兵站人员叛变也变成了土匪。这两股土匪与这一带的地痞流氓狼狈为奸，纠合在一起，为非作歹。他们主要抢劫过往客商和运输车辆，有时也到远处的村寨打家劫舍。这些土匪十分凶狠狡猾，一般不敢拦截袭击军车。

4 月 25 日，周恩来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乘汽车在甘泉劳山附近遭土匪伏击，牺牲 10 余人。周恩来的手枪丢在车上，被土匪掠去。这支手枪是西班牙式的，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从罗卓英部缴获的。后来，周恩来又去西安谈判，需要自卫武器，就把王平和杨成武等人的手枪调去挑选。王

平的手枪口径稍大一点，被周恩来留下了。

袭击事件发生后，军委命令红 27 军剿灭这两股土匪。该区塬峁遍布，沟梁纵横，人烟稀少，林草丛生。在这样的地形地貌上剿匪难度是很大的。

受命之后，军首长召开会议，分析土匪出没区域，活动特点和规律，研究制定剿匪方案。剿匪部队采取了路边设伏，分片搜索，集中合围和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剿匪。第一步红军的方针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重点在公路两侧设伏，首先以军事手段打击土匪的猖狂活动，打掉其嚣张气焰。第二步在土匪活动减少，逐渐退居老巢之后，红军的方针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土匪包围起来，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利用土匪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们。从东北军拉出来的那股土匪人多势众，是哥老会的变种。贺晋年参加红军前曾加入过哥老会，懂得一些暗语，便通过各种关系做工作，分化其内部。后来，土匪发生内讧，头子被杀，有百余人在临镇投诚。到 7 月初，这一带的土匪基本被肃清，消除了延安至西安一线的隐患，保障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人民群众也得以安居乐业。

真挚的爱情 简单的婚礼

1937 年 5 月 16 日，是罗荣桓和林月琴结婚的日子。这时，延水河两岸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绿油油的，地里的高粱、谷子都长出了嫩嫩的小芽。山崖上，迎春花、百合花、山丹丹花，竞相开放，五颜六色的花蕾，扑鼻的清香，令人心醉神驰。东风习习，春光明媚，给婚姻带来了吉祥、和谐的气氛。

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革命者没有多少充裕的时间，携手并肩，花前月下，情愫绵绵，谈情说爱，一般男女双方志同道合，谈得来，便很快可以成为有情人和眷属。罗荣桓和林月琴也是这样。一段时间，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每当晚霞抹红西方的天空，夜幕即将降临时，都要练习骑马，并笑嘻嘻地把警卫员、马夫支走。同志们晚饭后常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说：“他一个人练骑马去了。”不少人心中纳闷或小声嘀咕：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身经百战，长征二万五，难道还不会骑马吗？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正在党校学习的林月琴，她只要看到罗荣桓骑着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校门，于是校外的小树林里，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这时，飞倦了的小鸟也唧唧喳喳地或飞向林中，或棲栖在屋檐下。

一天，一轮明月当空，银白色的月光照得河水亮晶晶的，也映出了罗荣桓高大的身躯和林月琴的倩影，四周万籁俱寂，只有流水在悄悄地歌唱。

“小时候，我只念过《百家姓》、《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军后，由于张国焘实行愚兵政策，打击知识分子，吓得我不敢看书学习，从前学习识的字，也大半还给了老师。”林月琴诚恳地说。

“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嘛。”罗荣桓鼓励道。

“听说你是大学生，又是个大将军，文化挺高，军事政治什么都懂，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呀。”林月琴进而又说。

“你也有很多长处嘛。听何长工同志讲，在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翻雪山，三过草地时，你带领一批童养媳和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

食弹药，缝制军衣……你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能有你这样的女同志终生为伴，我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林月琴平心静气地听完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心里感到暖烘烘的，但不知为什么，她的头却不由自主地低垂下来，半晌没有再说什么。

接着，罗荣桓又说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包括他曾结过婚，老家还有一个女儿，可他参军时已经写了离婚书，脱离了婚姻关系的情况，以及自身的一些弱点。可谓推心置腹。真诚坦率的交谈，进一步密切了两人的感情。于是，他们很快向组织提出结婚的申请。

简朴的新房里，贴上了鲜红的喜字，用两张铺板拼在一起的本板床上，铺上了林月琴刚刚翻晒过的一张狗皮褥子，上面盖上一个旧毯子，两床半新半旧的棉被放置在床铺中央。再加上借用房东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竹椅和一个脸盆。此外，新房里别无其它摆设和家什。

这天，正好星期日，前来贺喜的战友络绎不绝。那时不兴送礼，只有远在西安的老战友宋裕和给捎来半袋白面。于是罗荣桓请伙房的炊事员给擀了很多面条。

婚礼十分简单，没有酒肉，没有水果，甚至连一块奶糖都没有。尽管那时物质生活很菲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新房里，高谈阔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同心同德，甘苦与共，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高潮的到来，为民族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贡献力量，建功立业。

洞房花烛之夜，政治部的所有同志，无论是部长、干事、警卫员、马夫和全体来宾都吃了新郎新娘的喜面。尽管面条里没有肉，连油也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但大家仍然感到香气扑鼻，味道极好。从此，罗荣桓和林月琴，开始了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和衷共济、艰苦奋斗的美满幸福的生活。

陈毅被捆绑上山

陈毅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在对敌斗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而在江西苏区时，他却有一段被自己人捆绑、险遭不测的经历，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那是 1937 年秋，国共合作刚刚建立。国共两党决定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可是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在赣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全国的形势发展和我党的政策几乎一无所知。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天天在作欺骗宣传，使人不得不提高警惕。

一天，驻扎在永新、宁冈、茶陵三县交界的红军游击队得到情报：有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戴眼镜、坐轿子的大个中年人，只身带着一个随从，在山下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和谭余保的下落。这个消息引起了游击队员们的注意，他们立刻下山找到那人，不容分说用黑布蒙上眼睛，带上了山。

“嫌疑分子”上山来一进游击队的驻地，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落落大方。他打着招呼说：“同志哥，你们这里好难找啊！”接着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党代表陈毅，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代表中共中央跟国民党谈判。今天到你们这里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这里有介绍信。”

游击队负责人段焕竞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写着：“特派党代表陈毅同

志，来你们这里联络。”落款是“项英”二字。尽管是白纸黑字写着，但没有人敢相信他就是党代表，没有人敢相信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了。三年来，红军游击队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苦头，无数烈士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现在山下，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林立，地主恶霸作威作福，劳苦大众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国民党同共产党结下的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这两个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怎么能够握手言和合作抗日呢？无数残酷斗争的事实使红军游击队不敢轻信。他们决定将陈毅送到省委，送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

省委最先接待陈毅的是肃反委员会主任颜福华等人。陈毅首先向大家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解国内外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说明国共两党合作、一致对外的必要性。颜福华没有听完陈毅的这番话，就火冒三丈，断定陈毅是“国民党说客”、“叛徒”，叫人把陈毅捆了起来。陈毅说：“你们为什么捆我？我要见谭余保，要见省委！”颜说：“可以，但是你必须把叛党的经过全部讲出来，不然，就砍你的头！”陈毅反复申明：“我是代表江西中央根据地去和敌人谈判的，我不是叛徒。”但颜一点听不进去，叫他松绑也不松。陈毅暗想：这回要完了，让共产党把自己杀了实在是冤枉啊。（这里顺便提一下，有材料证实，颜是个左倾机会主义者，后来叛变了革命。）

很快湘赣边区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来了。谭余保对陈毅说：“我认识你，在井冈山的时候，我听过你作的大报告，你不是说要革命吗！要坚决吗！不要投降吗！你现在怎样了！”

陈毅问：“我现在怎么样了？”

谭余保的嗓门越来越大，他说。“你现在投机了，投降了敌人。你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同资产阶级合作了，还要拉我们去合作。我们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你们坚持游击战争，很光荣，我赞成。你们坚持了三年，保存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支队伍，很不容易，对革命很有贡献。可是你们不顾全大局。你们是共产党员，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来向你们传达指示，你不能这样讲话！更不能如此对待我！”

谭余保说：“你很会耍嘴皮子，我就是不去合作。”

陈毅说：“你这个领导同志讲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笑话！”

谭余保发怒了。他摸摸腰间的手枪，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场的警卫人员都紧张地等待着谭余保的命令。但是，陈毅依然谈笑自如，面不改色。他平静地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嘛！怕死不当共产党，怕死我就不来找你们。共产党员要坚持真理嘛！你可以派人到吉安、南昌、延安去查一查，我这次来究竟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你是这里的主要负责同志，你必须对湘赣边区的革命负责，对边区人民和游击队负责。像你这样搞下去就会妨碍抗日救国的大事，你对不起党，也辜负了湘赣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对你的信任！”

听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谭余保有点动心了。为不露声色，他马上让人把陈毅带下去，结束了这场剑拔弩张的“舌战”。当晚谭余保便派人去吉安调查陈毅的来历。

两天以后，派去吉安的人回来报告说：“吉安确实有个新四军通讯处。”“没听说陈毅叛变。”谭余保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晚，谭余保亲自给陈毅松绑，主动找陈毅谈心。他诚恳地说：“你和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

讲话，就应该讲共产党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两位革命家促膝谈心，通宵达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谭余保对陈毅说：“你讲的道理很对，我愿意接受。我今天就派人同你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去！”

董振堂浴血高台

1936 年 12 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西北高原的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西路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长途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夜晚到来了，不知是谁吟诵起了唐朝诗人岑参的名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这诗句，或许正是此时行军的写照。

一会儿，月亮出来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红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

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女儿，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

嗅觉灵敏的马家军，发现红军西进，马上集兵尾追，不时突袭。红军以红 5 军开路，30 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

1937 年元旦，红 5 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 1400 余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从永昌、山丹、临泽逃往高台的一批反动政府官员，亦束手就擒。1 月上旬，红 9 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 30 军离 9 军不远，驻仉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和 5 军一部，驻临泽县城。

这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真是多事之秋，局势变幻难测。中央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此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

怎么办？想来想去，决定电请中央派 4 军、31 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两州根据地创造条件。

但是，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来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西路军的领导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原来，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 40 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马步芳得意忘形地笑了：

“这一下，我要把这些赤匪全部歼灭在此地。”

于是，在马步芳的命令下，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

1 月 12 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红 9 军、30 军，而集中 4 个旅另 3 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 5 军驻地高台县城。

5 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

进攻的前夕，马步芳的部队举行了宣誓。一匹快马疯狂奔驰着，马上的人举着大旗声嘶力竭的狂喊：

“韩旅长保证，高台攻下以后，城内的财物、银元、女人都归你们……”

马家军的士兵已被训练成一群暴匪，随之发出一片叫喊，大戈壁在冷风中颤栗。

1 月 12 日黎明，马家军在大戈壁滩上摆开了杀气腾腾的阵势，黑马队、黄马队、白马队、灰马队一字排开，两旁配以大炮。马步芳是最重视军事实力的，他的骑兵也是他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红 5 军军长董振堂面对飞扬的烟尘，断定敌人必以炮火开道，即向全军将士发出隐蔽的命令，整个高台的红军和百姓一起伏到战壕里，掩体后。

就在这一瞬间，炮弹降落了，烟尘、弹片、巨石一起升腾旋宕，笼罩了整个石城。

炮击过后，马家军的手枪团、步兵团肩扛云梯，手持绳索、铁钩，向高台两丈高的土墙冲击，后来，这些贪婪的野兽，在长官许给的财物、银元、女人的引诱下，搭上云梯，挂上挠钩，一群群向上爬。

埋伏在城墙后、战壕里红军战士一跃而起，向人头攒动的敌群投去一颗颗手榴弹，向悬挂在绳索铁钩上的敌人扣动了扳机。参战的群众抬着木椽，捅云梯、撬铁钩。成串成串的敌人一面呼救，一面“扑扑嗵嗵”下饺子似地摔到高台城下。马家军的污血涂满石砾，尸体在城墙下一片狼藉。

红军和高台人民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但失败既使马家军疯狂，又使他们冷静。他们在城墙下寻找进攻的焦点。

东、西城各有一个大碉堡，其高度都在 30 米以上，从兵家的眼光看来，虽都在城墙以外，但占领这两个制高点，便可用火力控制全城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两座碉堡正是董振堂严密布防的地方。一个由 39 团 1 个排守卫，一个由 45 团 1 个连守卫。他命令两个团的领导人亲自指挥这两个前哨阵地。

马家军也看到了这两个前哨阵地，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

1 月 15 日，两个营的马家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城西的碉堡发起进攻。机枪、手榴弹已经混成一片。马家军冲锋一次，留下一片尸体。而凶残的马家军人竟踏着尸体的阶梯向上冲击。红军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就推下滚木、石块。马家军退缩了，又留下一片血肉。

战斗到第 5 天，恶毒凶残的马家军堆柴点火，燃着了碉堡。

烈火使红军战士们悲昂起来，你抱着我，我搂着你，相互激励，相互告别。然后分散到碉堡各个垛口上，面向全城高呼：

“再见了，同志们，董军长，胜利属于我们！”

董振堂军长悲哀地脱下军帽，泪光滢滢。火苗扑到战士们身上，从衣服烧到肉体，从脚下烧到躯干。战士们的双眼一直没有闭合，目光炯炯地望着繁星灿烂的夜空。

西碉堡失守之后，东碉堡也被马家军攻下。

失去两个制高点，红军仿佛被斩去双臂，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了。

城北是一片荒凉的草地，衰草连着附近的北山。部队只要翻过山去，就有生存的希望。只等董军长的命令了。但是，就在这时刻，驻扎在临泽总部的 5 军政委黄超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

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西进的必经之地，不许突围，必须死守！

董振堂震惊了，眼睛涌出泪水。死守，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知道现在不走，再也没有路可走了。但董振堂只字未吐，接受了这个泰山压顶的命令。

总部也没有错，5 军在高台没有电台，总部无法与 5 军联系，不知道 5 军战斗的实际情况，他们以为高台仍可坚守下去。因为高台确实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具体据点，一旦丢失，对于总部下一步西进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将产生重大影响。

该军的团以上干部，又聚集到天主教堂来。董振堂让人点亮教堂内所有的蜡烛，传达了黄超的来信与指挥部的决定：人在高台在，红 5 军与高台共存亡。

开会的人默默地回到了阵地。战士们从城墙上，战壕里向一块集结，举行了最激动人心的宣誓。他们悲恸而豪壮地喊着：

“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董振堂与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走出天主教堂，分头奔向东西两个战场。董振堂走过一条又一条战壕，检查着工事、武器弹药，就像最后诀别一样，同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战士紧紧握手。是的，最后的时刻到了。董振堂走到城墙高处，看见几个女战士正把箱柜抬到被炮弹打塌的城墙豁口处，向上面浇泼冷水。她们的衣服湿了，一个个像披上了闪光的甲胄。她们与军长握手，致意，脸上流露出凄凉的神色。

黎明时分来临了！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随着雄鸡悲怆地啼叫，马家军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向高台推进，敢死队在前面开路，后面排列着正规军，拚命向城墙上爬。经过一夜准备的红军战士扔下第一批石头，射出第一排子弹。几个爬上城墙的马家军，也被红军掐死。攻城的任务落在那些训练有素的马家军正规军身上。

城墙上的战斗进入白热化。

马家军爬上城墙，女战士们抬着滚滚的开水往下倒，一时城墙上挂起无数似瀑布的热流，城外一片嚎叫声。

柴烧光了，开水用完了，手榴弹打尽了，枪膛里再也推不上一发子弹，红军战士们就举起了大刀、长矛、棍棒，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就在这形势危急的时刻，董振堂召开了紧急会议。50 多位各级指挥员、政工干部从各个垛口走来，有人浑身是血，有人身上冒着黑烟，见了面便紧紧拥抱起来。董振堂看着每一个熟悉的面孔，心如刀绞，低沉地说：

“同志们，我们宣誓，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打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守住高台！”

50 多个男子汉，紧握着拳头，随后复诵着，声音沉重如起落的铁锤：

“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活着的同志会为我们报仇。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到来！”。

就在这生死关头，被改编的民团里有人被激烈的砍杀吓破了胆，在城墙

东南角让出一块地方，马家军像饥饿的狼，成群结队，一下子扑了进来。

更为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红军的炊事员，司号员，女战士都投入了厮杀。

在两军决战的战场上，女战士更没有退路，如果做了俘虏就意味着被蹂躏，被侮辱，被贩卖。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她们有的在敌人包围中拉响了有意留下的手榴弹，与敌群同归于尽；有的赤手空拳抱着敌人撞墙而死；有的把敌人撕咬得血肉模糊；有的在自己身上点起大火冲向敌群。

激战在进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不忘政工干部的使命，登上民房高声做战斗动员：

“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坚待到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杨克明依托着一座民房，一面指挥一面鼓动。10 多个小时，敌人都未能占领这块阵地。

傍晚来临了，马家军调动重兵来围攻这块地方，机枪、迫击炮一起射击，迫使杨克明和战士们且战且退，转移到另一座民房里。

马家军久攻不下，便思谋着这片民房里一定有位红军的指挥官，决心用火攻了。房屋起火了，在烈火里还听见一个坚强的喊声：

“同志们，最后胜利属于我们！”

这是杨克明激昂的声音。

这是一个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1937 年 1 月 20 日。

这一天，从黎明到黄昏，军长董振堂骑马驰骋在城墙各处指挥，鼓舞士气。他的出现就是一种号召，战士们把十倍于己的敌人打下城去。可惜高台终于在敌我力量完全失衡的对比中失守了。当马家军蜂拥到城内时，董振堂参加了激烈的巷战，在高台的东南角凭险还击。

董振堂当战士时就是有名的神枪手，只见他手持双枪，左右开弓，准确无误地把每粒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大批马家军向他拥来。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号兵了，马家军迫近了，疯狂地喊着：“抓活的！”

董振堂一抬手，射出一梭子弹，就势拉着号兵跳下城墙。他们腿摔断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对号兵说：

“突围吧，我掩护你。”

“不，我不能丢下你，要活在一起活，要死在一起死！”

“不，能活下来，就不能轻易死，现在我掩护你突围！”

哨兵还想什么，但他看到军长那刚毅的方型脸庞上，露出了严峻的、不容分辨的神色.仿佛在说：

“这是命令。”

号兵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董振堂拖着伤腿向前爬了几十步，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地方，把全部子弹压进枪膛，射向敌人。然后，把最后一粒子弹射向了自己的胸膛，这位生于河北省新河县的红军将须，时年仅 42 岁。

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红军高级将领，解放后国家分别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树起了董振堂纪念碑。

高台被攻下后，空前的浩劫开始了。马家军像一群野兽，争先恐后地闯进每家民宅，见财物就抢，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污，还放火烧民房，高台成为一片火海。

第 7 天，马步芳委派的执法队便挨门挨户的搜查。那些隐藏在群众家里

的红军重伤员，那些支援过红军的群众被枪杀、被活埋，共 2400 余人。

匪徒们终于找到了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等红军领导人的遗体。他们把这三位领导人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之上，以表示他们的残酷，炫耀他们的胜利。

董振堂是著名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杨克明、刘培基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马家军攻克高台，气焰更加嚣张，马上掉头围攻临泽。他们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的红 5 军余部阵地，而以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及经理部，干部战士毫不畏惧，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打得顽强英勇。激战 3 天后，守城人员突围而出，会同城外的 5 军另一部，抵达仉家营子。同时，9 军亦撤离沙和堡。

黑手高悬霸主鞭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与破坏。北伐军攻占南京，英、美等国以舰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 2000 多人，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南京事件，便是突出的事例。帝国主义加紧分化中国革命阵营，策动资产阶级右派叛变。蒋介石就是他们首先选中的对象。

这时，早就蓄谋叛变的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一拍即合，干了一系列反共反工农的罪恶勾当。1926 年 3 月 18 日，蒋介石指使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即诬蔑中山舰擅入黄埔，共产党阴谋暴动。20 日，蒋介石宣布戒严，下令逮捕了李之龙，并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所。接着又强迫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退出第 1 军。这是蒋介石献媚帝国主义，讨好买办阶级，反共反人民的重要步骤。11 月 22 日，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公开对英、美帝国主义表示友好，乞求他们援助。随后，蒋又派戴季陶、吴铁城去日本，向日本外相担保“ 中国人民不反日 ”，要求对方支持他们反对革命。1927 年 2 月，蒋还派代表到北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张作霖商谈南北妥协事宜。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他抗拒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的决定，截留经南昌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公开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企图独揽党、政、军大权。这些，都是蒋介石制造分裂，破坏统一战线，准备公开叛变的危险信号。同时，蒋介石加紧镇压工农运动，于 1927 年 3 月在江西、安徽等地制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反革命流血事件。

蒋介石制造的一连串的反革命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民群众同蒋介石进行斗争。1927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等决议。会议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但是，没有罢免其北伐军总司令等职务，也没有

公开揭露他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破坏革命的罪行。这就使蒋介石能够利用合法地位和手中的军权，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猖狂地向革命进攻。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策划反革命政变。他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其谄媚之容可掬。帝国主义则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 3 万人的军队，帮助蒋镇压革命。上海买办阶级则慷慨解囊，出 1500 万元巨款作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流氓帮会势力，亦甘愿充当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打手。

尔后，蒋介石调动嫡系部队进驻南京、杭州，以巩固和加强其反革命阵地，并将一部分同情工农的北伐军调离上海，调进忠实于他的旧军阀周凤歧部，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他还召开了一系列秘密反共会议，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在蒋介石磨刀霍霍时，陈独秀企图联合汪精卫，稳住蒋介石，以缓和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紧张局势，子 4 月 5 日和汪精卫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要人民“不听信任何谣言”，同国民党“开诚合作”。这种粉饰太平的言论，麻痹了民众，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同汪精卫一起到达武汉，随后中共中央机关亦迁至武汉。

4 月 12 日，蒋介石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工人纠察队进攻，纠察队奋起抵抗。蒋介石以调解工人内江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屠杀工人。13 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召开 10 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周凤歧部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遭到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枪击，100 多人牺牲，伤者无计其数。接着，蒋介石在上海解散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 4 月 12 日至 15 日，仅工人被杀者即达 300 多人，被捕 500 多人，失踪 3000 多人。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地进行了血腥屠杀。同时，张作霖也同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著名的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便死在他的屠刀下。

新旧军阀的暴行，使革命蒙受了严重损失。事先中共上海、两广、北京区委对敌人阴谋虽有所觉察，但未料到反革命事变来得这样突然和残酷，因而吃了大亏。陈独秀虽然自责，但是他和党中央都没有认识到这是右倾思想的恶果，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工农群众和建立革命武装上面，而是寄希望于同汪精卫合作。这样就使党内的右倾思想蔓延，发展成右倾投降主义。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加入了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蒋介石成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和倒行逆施，把中国拖入了更加黑暗和苦难的深渊。

此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军入豫。冯玉祥部出潼关，同北伐军会攻河南，击败 10 万奉军，会师郑州、开封。

这时，美、英、日等国支持蒋介石对武汉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面临危机。

原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扯去了伪装，解散农民协会，怂恿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到 7 月 15 日公开同共产党彻底决裂，同蒋介石一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屠杀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本质及反革命阴谋，缺乏正确的认识和革命警惕。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居于统治地位，它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同国民党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工农运动则横加非难和压制，甚至解散工人纠察队，以致在敌人进攻面前失去有效的反抗，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锻炼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造就了一批革命家和骨干，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撒下了火种，特别是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惨痛的教训，认识到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道路。

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英、美、日等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积极扶植和支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国民党南京政权采取各种残酷手段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力量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倒在血泊中。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 6 月，有 31 万多革命者被杀害，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党的队伍中一些人在政治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消极情绪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甚至变节投敌。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 6 万人减少至 1 万余人。在白色恐怖下，革命的工会和农会被查禁，在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 300 万人减至几万人。有 1000 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形势发生极大逆转，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转入低潮，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

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在不断加剧和发展。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与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站起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排挤与打击下，也逐渐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这说明，中国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革命的因素依然存在。

各派军阀间的长期对立和混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不因阶级矛盾的深化而消逝。当时，除继续盘据北方的张作霖等旧军阀外，新军阀主要有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集团、李宗仁集团，统治山西的阎锡山集团，以及实际控制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集团。他们相互勾结，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且又自找后台，各怀异志，展开争夺地盘和

权利的激烈斗争。1927 年秋，爆发了李宗仁集团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此后，各派间的军阀战争接连发生。军阀混战，互相残杀，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灾难，促使人民起来反抗，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有利于革命的成长与发展。

北伐战争的影响和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许多地方党组织保存下来了。共产党员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保存下来的大部分是经过严峻阶级斗争锻炼与考验的革命精华。中国共产党通过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在北伐战争中，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和广州等地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打击下，部分群众和一些农民武装仍在极端困难环境里坚持斗争。这是中国革命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全党同志与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迫切需要抛弃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的形成与制定有个过程。早在 1926 年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就提出过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立三、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等曾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 月，蔡和森等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在湖南则有平江、浏阳两县农军围攻长沙，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英勇举动。这些，虽然受到陈独秀的压制，但是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中强调指出：农民自卫军必须保留，必要时可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次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及屠杀人民的罪行，赞颂了工农群众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所作的英勇斗争。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20 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通告，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的任务。7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党所掌握的主要部队，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聚集力量，再行北伐。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在农民运动发达的这几个省份，以农会为中心，团结广大农民和各种社会力量，举行暴动，以动摇军阀政权，并争取在湖南和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会议决定委派最积极、最坚强和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去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深刻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仅，限制农民运动，不重视枪杆子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指

出：“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发言，对于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促使党走上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已经形成。

党的八七会议，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现党的指导方针的转变，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时期，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道路，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党如何领导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也可以说还没有解决。

秋收霹雳震神州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发出《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和《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确定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机，举行秋收暴动，要求把暴动的重点置于农民运动基础雄厚的以及有相当数量农民武装的湘鄂粤赣四省，特别是湖南省。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继彭公达之后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 1927 年 8 月 16 日，中共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书记。18 日，毛泽东参加省委会议，研究确定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此后，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对过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一致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新军阀的工具，屠杀工农，丧失了民心，起义不能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应公开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群众，立即坚决地树起革命的红旗。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支军事力量作骨干，“实行在枪杆子上夺政权和建设玫权”。毛泽东等认为，起义要看条件，量力而行，即不能按原来设想的在湘中、湘南、湘西和湘西南同时发动，而应集中党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在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一个地区发动起义。经过反复讨论，根据当时在长沙以东湘赣边界保存有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等条件，最后决定首先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宁乡和江西安源七县（镇）的起义，其他地区暂时不组织起义。毛泽东还就起义应打共产党的旗帜等问题致信党中央，中央在 8 月 23 日复信中指出：“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长沙之发动，须先从长平浏一带及潭醴衡一带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的和军事的），同时在长沙城应有充分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组织的准备，在宝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发动与湘中联合来攻唐许，并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沙发展，会合湘中湘南的力量，取得政权，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方于孤立。”这一指示同湖南省委的决定不尽一致。

毛泽东等人的认识和决策，同马列主义不要玩弄起义的精神是一致的，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上述决定，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往湘赣边界地区，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全面领导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9 月 15 日，中共湖南省委同毛泽东商

定起义行动计划，9 月 9 日开始破铁路，11 日七县同时起义，15 日长沙起义，16 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夺取省城。

9 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旋即又赶赴铜鼓。当时这个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主要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以及大革命后期建立的平江、浏阳两县工农义勇队。这些部队原拟参加南昌起义，但行至途中，因起义军已经南下，而转至修水、铜鼓地区，同党中央失去联系。此外，这个地区还有安源工人武装和集中在安源的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农民自卫军；罗荣桓领导的鄂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也到了修水。毛泽东把这个地区的部队收集起来，多次召集各部队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正式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部队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称“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将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第 1 军第 1 师，约 5000 人，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辖 3 个团，第 1 团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近 2000 人，钟文璋为团长；第 2 团由安源工人武装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农民自卫军组成，1000 余人，王新亚为团长；第 3 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组成，1000 余人，苏先骏为团长。起义前夕，还收编了流落在鄂南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 4 团。

秋收起义的部署是：第 1 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长寿街进攻平江；第 2 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并同第 3 团协同攻取浏阳；第 3 团自铜鼓出发沿东门、达浒一线直逼浏阳，同第 2 团密切配合，南北夹击，夺取浏阳。毛泽东随第 3 团行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针对湖南省委某些同志的盲动与轻敌情绪，毛泽东于 9 月 5 日自安源致信湖南省委，强调指出：长沙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在起义部队攻克株洲后方能举行暴动。毛泽东在周密地组织了起义的武装力量，部署了起义的进攻路线后，便赶赴铜鼓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动。

9 月 6 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立即“通令驻省各军，严加戒备”。同时由岳阳等地调动部队赶赴长沙加强防务，命令城区和郊区各县，突击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分子。从 8 日起长沙实行“特别戒严”。

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暴动队伍高举红旗，英勇的工农革命军手执刀枪，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熊熊烈火，从安源山下，烧到浏阳河畔，从幕阜山脉，燃遍湘东、赣西的辽阔大地。

9 月 9 日，按预定计划，两支 60 余人的破路队伍分别从黄岳、长株路线出发，拆毁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部分铁路.切断了敌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和湘赣边平江、浏阳、醴陵、安源等工农群众，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同时起义。

第一路即第 2 团，起义前首先解决了安源矿警队的反动军官，控制了安

源，并秘密处决了 8 个叛徒，纯洁了内部，于 11 日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因敌人早有准备，两度攻击不克。为了避强击弱，第 2 团挥戈西进，迅速攻克老关，俘敌人一部，缴获部分枪支，12 日下午攻克醴陵县城，击溃守军 1 个营，缴枪 60 余支，处决伪“清乡”大队长，并打开监狱，救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4 日，国民党军队经株洲向醴陵进攻。第 2 团转向浏阳前进，在浏阳农民的紧密配合下，于 15 日攻占浏阳。后因疏于戒备，遭到由醴陵追来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人员和枪支损失过半。

第二路即第 1 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龙门，首先向驻平江以东长寿街的反动武装 1 个营进攻。当先头部队同敌人接触时，主力遭到由余洒度收编的邱国轩部的袭击致腹背受敌，损失人员和枪支各 200 余，遂停止进攻，转向第 3 团靠拢。

第三路即第 3 团，由铜鼓出发，于 11 日一举攻克白沙市。12 日在白沙市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当日下午，第 3 团向浏阳东门进发，守敌望风而逃，起义军占领东门市，消灭反动武装一部。14 日，第 3 团遭到达浒反动地方武装的反攻，伤亡较大，即撤至上坪。鉴于三路进攻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于 17 日下达向浏阳文家市撤退的命令。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的同时，中共醴陵党组织领导四乡农民纷纷起义，打击豪绅地主，配合起义军攻占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并打开监狱救出一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在浏阳，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工会、农会活动。在此期间，原计划的湘潭、宁乡、岳阳和长沙市的起义，由于国民党势力强大和革命力量遭受摧残，未能广泛发动，只有长沙县的工农群众进行了一些镇压豪绅和解散团防局的活动。

上述情况表明，农民起义必须有一定的正规部队作骨干，农民武装须经必要的训练，收编的土杂武装需要加以改造，才能真正担负起武装起义的历史使命，少遭受失败或损失。

9 月 19 日，工农革命军第 3 团、第 1 团和第 2 团的少数人员，陆续集中到文家市。当晚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任务，对部队的进军方向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正确主张。余洒度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否认敌强我弱和秋收起义战斗失利的客观事实，不了解指战员的情绪，盲目坚持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会议最终否定了会攻长沙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会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这个靠近中心城市，反动力量强大的地区，改向罗霄山脉转移，以寻求立足点保存革命力量的正确意见。这一重要决策开中国武装革命正确道路之先河，为工农革命军指明了胜利方向，避免了新的损失。

9 月 20 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召开工农革命军大会。毛泽东根据前委会议精神作了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是低潮，敌强我弱，不能同敌人硬拚。革命军吃了几个败仗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保存了力量，革命高潮就一定会来到。大城市好是好，但目前不是我们立足的地方。要寻找群众基础好的地方，积蓄力量，建立根据地，罗霄山脉中段，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很好，在那里敌人几万人也无奈我何。只要依靠群众，团结奋斗，聚积力量，待机破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的这番话，在起义部队遭到挫折的紧要关头，极大

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指明了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讲完话后，即率领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原打算经萍乡去莲花，部队到达上栗市侦知萍乡有敌人重兵守卫，故绕道芦溪。9 月 24 日，部队从芦溪出发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工农革命军当即组织抵抗，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5 日，工农革命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莲花县城，摧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打开监狱，救出 7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9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这时，部队人数不足千人，组织很不健全，一部分人经不起革命挫折和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混乱、悲观动摇。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建立了民主制度，规定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遣散了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将原来的 3 个团缩编成 1 个团，称工农革命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辖第 1、第 3 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全团不到 1000 人。

工农革命军通过三湾改编，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整顿，特别是实行了“ 支部建在连上 ”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10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的古城。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团结教育、改造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同袁、王所部建立了联系，送给他们 1000 余支枪，同时把一批伤员留在当地休养。在古城原第 3 团团长苏先骏脱离了部队。此后工农革命军由古城南下，于 10 月中旬到达井冈山西麓湖南酃县的水口。师长余洒度对革命丧失信心，借口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离队出走。起义时的团以上领导人只剩下毛泽东和余贲民。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根据是：他在率领工农革命军转移过程中，通过沿途的调查和考察，逐步了解到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反动统治势力较弱，该区群众基础好，有大革命的影响，还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各有 60 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而且地势优越，有井冈山、九陇山等多处山险，进可攻，退可守，物产比较丰富，有利于建立军事根据地。

10 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由水口转至江西遂川县境，在大汾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前委即率部队经荆竹山，27 日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从此，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先在武装起义中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坚强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敌人中心城市的方针，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不仅

保存了武装起义的基本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把革命力量转向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为发展革命军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刀枪齐举幕阜山

1927 年 8 月 5 日，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大纲》的要求，制定了《鄂南暴动计划》，决定以蒲圻、咸宁为中心点，取得两城后，再取嘉鱼、崇阳、通山、通城 4 县。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修改了秋收起义计划，并把鄂南作为起义的重点地区。还先派符向一，又相继派吴德峰、黄赤光、罗亦农、吴光浩、刘镇一等到鄂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建立党组织，组织领导起义工作。8 月中旬，组建了鄂南农民军，辖 5 路农民军。8 月下旬，成立了以吴德峰为书记的中共鄂南特委，负责组织领导鄂南起义。

8 月 20 日，在中共通城县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通城县长王武扬、省农协特派员罗荣桓、崇阳农民自卫军队长叶重开等率领通城、崇阳两县农民首举义旗，夺取了通城县城，全歼团防局，缴枪 200 余支，并正式成立了通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任总指挥，罗荣桓任书记，辖两个大队。还成立了通城县劳农政府和通城县农民协会。通城起义，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政权，揭开了鄂南地区武装起义的帷幕。通城起义胜利后，国民党急调正规军及地方武装进逼通城。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武装于 9 月 4 日向修水转移，途中遭敌袭击，大部离散，仅剩 100 余人，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 月 30 日，通山农民再举义旗，重占县城，并于次日成立了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起义胜利后，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后将该县县长等反动官吏处决，农军在夏桂林率领下转至咸宁，加入了鄂南起义的队伍。

以通城、通山为先导的起义，造成了鄂南起义的有利态势。9 月 6 日，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鄂南，具体部署起义，定于 9 日夜开始起义，还将蒲圻农军编为鄂南革命军第一路军，由漆昌元任总司令，王钟任军事指挥，辖 5 路纵队。9 月 8 日，中共鄂南特委委员黄赤光等率农民武装在中伙铺车站袭击国民党军车，俘敌 1 个班，缴枪 16 支、子弹 5 箱和部分纸币、银元等。这标志着鄂南起义的正式开始。由于形势的变化，起义军改变了攻打咸宁、蒲圻县城的计划，转往农村待机破敌，拟与由土匪武装改编的“ 蒲圻人民自卫团 ”合取嘉鱼县城后，再取咸宁、蒲圻。鄂南待委在农民自卫军团长叛变投敌，起义军和特委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继续领导武装起义。从 9 月起，咸宁、蒲圻农民在羊楼司到汀泗桥 200 多公里的地段上开展声势浩大的活动，蒲圻起义农民围攻县城，使国民党驻军不敢出城。嘉鱼农民革命军在米埠起义，占领了米埠镇。10 日晚，吴光浩率领咸宁、通山农民革命军攻克汀泗桥，歼敌 20 余人，缴枪 20 支。在农军的打击下，驻马桥的国民党军约 1 个连被迫缴械投降。另一支农军攻占了官埠桥、贺胜桥等地。崇阳、通城、武昌以及大冶、阳新、鄂城等县农民纷起响应，打土豪，断交通，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如坐针毡。后农民起义军围攻咸宁不克，同国民党军苦战 3 日，遭到严重损失，剩下一二百人分散转入隐蔽斗争。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由于缺乏军事人才和斗争经验，没有及时转入山区开展斗争而失败，但保存了骨干，为尔后其他起义创造了条件。

革命风雪遍湘鄂

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暴动与鄂南联络，形成一独立之局面”的指示，决定在农民运动较好和地势优越的洪湖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并加强了对鄂中起义的领导。于 1927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初，先后派王平章、萧仁鸽、任旭、黄鳌前往鄂中地区，加强特委领导力量和检查工作，为了便于指挥，还将鄂中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北部辖汉川、天门、京山、应城 4 县，由王平章负指挥之责；南部辖沔阳、潜江、监利 3 县和新堤市。9 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鄂中特委，鄂中北部工作集中于汉川杨林集及天门东乡一带，鄂中南部工作集中于沔西一带，组织农军向监利发展，破坏敌之长江交通。

中共鄂中南部特委和沔阳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由萧仁鹄、邓赤中等领导农民武装 30 余人于 9 月 10 日夜，在戴家场首先起义，组成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接着游击队曾攻克沔阳县城。后转入沔西同王尚武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后改称第 5 军），萧仁鸽任军长。从此，开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震动了江汉平原。

鄂中起义后，在任旭的主持下，于 9 月初成立了以张计诸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并确定曹壮父任起义军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9 月 9 日，中共鄂西特委制定了《鄂西暴动计划》，确定长江南以公安县为重点，长江北以当阳为重点，分别起义，合取荆沙。中共当阳县委于 9 月 7 日组成了以李超然为总指挥的农民起义指挥部，随即组建了 2000 余人的瓦仓区农民自卫团，汪效禹任团长。9 月 14 日夜，汪效禹率农民自卫团打垮了国民党驻石马槽的区团防局，捕杀了部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于次日成立了当阳县瓦仓区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当阳县观音区农民自卫团 800 余人起义。在一个月内，形成了以瓦仓为中心，包括当阳及相邻的远安、荆门、南漳在内的约 1500 平方公里、12 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后在国民党军和几县反动武装万余人的“清剿”下，农民起义武装苦战失利，突围出来的 100 余瓦仓农民自卫军，转入游击活动。

9 月 1 日，在任旭、黄鳌的主持下，中共鄂西特委在公安县召开有公安、江陵县委及湖南澧县农民武装负责人参加的军事工作会议，成立了由江陵县委书记刘植吾、公安县委书记胡竹铭等组成的暴动指挥部，由覃济川任总指挥，并决定以公安人民自卫团为主力，发动江陵、公安两县农民起义。19 日，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及澧县农民武装在郑公渡集结，20 日顺利占领公安县城（今南平镇）。接着，在江陵农民群众配合下，攻占弥陀寺，缴获部分枪械和物资。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鄂西革命军。鄂西革命军在国民党军进攻下受到严重损失。余部在杨荣祥、邹资生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反捐税斗争。这两次起义，震动鄂湘两省，鼓舞了洪湖地区人民的斗争意志。起义武装在优势敌人的反扑下，被迫转入农村坚持斗争，为革命保留了骨干。

红旗飘飘进三湾

1927 年 9 月 11 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反动军

队势力强大，起义部队成分复杂，部队接连受挫。

9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上坪紧急召集第 3 团部分干部议事，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路部队赶到浏阳县文家市集合。

9 月 19 日，起义部队前委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小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时，四面的敌人向起义部队进逼，起义部队在顽强抵抗。文家市弥漫着硝烟。

里仁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争论激烈。师长余洒渡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只有取浏阳，攻长沙，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援，给敌人以真正的打击，建立城市政权，使革命取得成功。”然而，他的话得不到多大的支持，到会的人都十分清楚，光凭起义军这点部队，去同数十倍的敌人去拼，将如同以卵击石，眼前的挫折即是例证，但谁也拿不出其它的主意。带领起义部队向何处去，这是保存还是丧失革命力量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站起来，仔细分析了当面敌情，严肃而又坚定地指出：“必须放弃起义部队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目前，我们的农民起义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攻占长沙的，只有将起义部队转向山村和农村，才能免遭反革命势力的围歼。”

大家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看法，特别是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最后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

自从长寿街战斗失利以来，起义部队连续作战，疲备不堪。起义部队且战且走，艰难地转移。

9 月 22 日，部队到达芦溪宿营。23 日晨，部队刚一出发，突然遭到江西国民党军一部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奋力指挥掩护部队转移。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卢总指挥壮烈牺牲。

部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继续转移，起义部队中大多是刚参军的农民“娃娃”，没有作战经验，更没经历过这种艰难的战争环境，他们体力弱，被拖得疲惫不堪，伤亡严重，在不断遭敌袭击追堵中，许多士兵十分恐惧，部队减员很大，士气极其低落。卢德铭总指挥的牺牲，使起义部队失去了一位坚定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起义部队更加难以控制，有些人悄然离开了队伍。

29 日，部队到达三湾村，这时部队已不足千人。三湾村是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这里远离城市，又无地方反动武装，起义部队连日转战，终于可以在此暂时休整一下了。

毛泽东从向进风山转移以来，一面指挥部队打仗，一面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问题。起义失利后，在连日转战中出现的逃亡现象，使毛泽东更深刻地认识到：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去密切联系和组织战士群众，才能使队伍巩固和发展。党不在群众中生根，就抓不住军权，一旦反动派倒戈，革命者就会丧失军队并遭迫害。面对思想混乱的形势，毛泽东顾不得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子，连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部队进行改编的意见和具体方案，得到前委的通过。

第二天一早，部队集合了，师长余洒渡走到队前，情绪沮丧地讲到：起

义失败了，人员减了许多，现在人少了，部队要缩编，把一个师改为一个团，现在一个团还不足，只得改编为两个营。他的讲话，显得整编无可奈何，只是在人员少的情况下，不得不合并。

战士们呆呆地望着讲话的师长，沉默无语，余师长讲话时已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他讲完话走下去了，队伍毫无反响，往日他讲完话时的热烈振奋的掌声没有了。

正在这时，一个面庞消瘦、头发蓄得很长的高个子走到队伍面前，他身穿一件旧棉袄、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一双草鞋，脸上露着笑容，腰板挺得直直的。他望了望大家，和蔼的神情中充满着自信和希望，大家对他十分熟悉，他就是连日率领他们艰难转战的毛委员。一阵掌声，打破了消沉的情绪。毛泽东操着大家熟悉的乡音说：“同志们，敌人凭着势力暂时强大，妄图扼杀革命力量，这有什么了不起。革命军吃了几个败仗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打监卡，我们就不能起家吗？贺龙现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革命总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咱们都是起义出来的，只要大家团结奋斗，革命就会成功。反动派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一个人可当敌人十个。我们的革命为着给穷苦人民打天下，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必定会成功。”

毛泽东的话，使起义部队情绪振奋起来，人们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接着，毛泽东还宣布，这次部队改编，那些不愿意留下作艰苦斗争的官兵可以离队，并发给路费。

革命者在烈火中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洗礼和在艰难困苦的失败面前是坚持斗争还是退缩的考验。大部分官兵留下来了，他们从毛委员的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整编中，毛泽东把自愿坚持斗争的近千名革命坚定战士编为 1 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下辖第 1、第 3 营共 6 个连，此外还编了特务连、军官队和卫生队。在整编中，提出和制定实行一些原则和制度：在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部队在三湾时，毛泽东还强调了革命纪律和做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三湾人民历来受兵匪之害甚烈，群众一看到军队就畏惧而逃，当工农革命军进至三湾时，青壮年纷纷逃入山林，只留下几个老人探听情况。毛泽东见此情景，立即派人到山里喊话，并发动广大官兵，为人民群众喂养牲畜，修整农具，工农革命军的严明纪律和模范行动，使群众消除了疑虑，躲到山中的人陆续回到村里。工农革命军进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迅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后来在三湾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三湾改编，部队的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队伍更加纯洁坚定，战斗力更强了，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士兵的民主权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愉快，较之从前过优越生活的日子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三湾改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几经转战，

于 10 月 27 日胜利到达井冈山。

秦川渭水舞干戈

1927 年 9 月 26 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农民斗争决议案》，提出“在斗争中组织发展，以大无畏精神去坚决领导农民斗争”的口号后，各地方党组织把发动农民起义，打击敌人，锻炼人民群众，创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作为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积极进行了武装起义的组织与发动工作。

清涧起义。1926 年秋，冯玉祥部进入陕西，中国共产党派出干部到冯部领导政治工作，创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建立了陕西总工会与农会，使农民运动得到发展。次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陕西当局也走向反动，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武装起义方针，积极组织兵暴和武装起义。1927 年 10 月 12 日，谢子长、唐澍、白乐亭等领导陕西国民党军井岳秀部第 11 旅一部在清涧起义。起义军积极行动，相继占领延长、延川、宜川，并编成 3 个营，共 1700 余人。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不懂得依托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当敌人集中兵力围攻时，起义军被迫退据大南川。突围时，第 2、第 3 营没有撤出来，第 1 营被敌人诱骗，起义军遭到失败，仅剩 20 余人，转入隐蔽斗争。这次起义，开西北地区武装起义之先河，打击了当地国民党反动派，为尔后西北红军的建立准备了骨干，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一些基础。清涧起义后，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武装起义，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

清涧起义失败后，唐澍、谢子长又在韩城西庄领导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谢子长分别任正副总指挥。起义军由于没有注重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形成单纯军事行动，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轻率进攻宜川城，终于遭到失败。这次起义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为尔后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1928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发动渭南、华县农民和部分国民党西北军武装起义。4 月下旬，在西北军新编第 3 旅负责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唐澍，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领该旅 1000 余人，由潼关开往高唐镇的途中，宣布起义。起义军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接着，渭南、华县 1 万余农民，在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和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于渭南的崇凝及其附近地区起义，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和陕东赤卫队，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活动。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声威大振。6 月中旬，国民党以 3 个师的优势兵力，向起义武装进攻，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进行英勇抗击，并向雒（洛）南方向转移。不久，起义武装在渭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部队被打散，唐澍牺牲，少数人员分散转入隐蔽斗争。渭华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疯狂进攻下，虽然失败了，但是保留了革命种子，为尔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栒邑农民起义。1928 年春，陕西栒邑县农民的抗粮斗争遭到国民党的暴力镇压，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中共栒邑县委决定利用时机，举行农民起

义。5 月 6 日，中共地下党员许才升、吕佑乾召集清水塬各村群众，以抗粮为名，聚众起义，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并杀了大地主程茂育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催粮官员，连夜向栒邑县城进发，沿途农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次日拂晓，在城内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攻占县城，捣毁县政府机关，打开监狱，释放无辜，惩处管粮官吏，开仓放粮。接着成立了栒邑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了红军渭北支队。起义军在敌人的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和县委书记吕佑乾等被杀害。

玉田枪声动平原

1927 年 9 月上旬，中共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在北京正式组建了北方局。9 月 22 日，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和秘书长蔡和森在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和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并决定以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玉田县为中心，发动冀东农民暴动。接着，召开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制定了京东（玉田、遵化、丰润、蓟县）农民暴动汁划。当时，京东的玉田、丰润、遵化、蓟县 4 县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玉田县农会发展尤为迅速，全县有农会会员达五六万人，共产党员 200 多名，并建立了农民自卫队。

10 月 18 日，中共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领导 2 万余农会会员起义，攻占了玉田县城，解除了警察和保安队的武装。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匿。这时，中共京东特派员叶善枝（后叛变），强令起义队伍立即解散，撤出县城，使起义武装蒙受重大损失。中共顺直省委随即派于方舟带领一些军事干部，加强对起义武装的须导。接着便召集失散离队的起义农民归队，成立京东人民革命军，杨春林任总司令，张明远为总指挥，刘自立为参谋长。经过短期整顿，队伍达数百人。11 月初，人民革命军从遵化王爷陵向玉田城进发。途中，在攻打东峪村时，遭到地主武装和民团的围攻，敌众我寡，加之起义军缺少武器、弹药和军事人才，遭受严重损失。部队突围后，于方舟、杨春林等在丰润县流沙河附近被俘，不久惨遭敌人杀害，起义武装遂告失败。

玉田农民起义，在中国北方打出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建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开华北地区武装起义之先河，给生活在暗无天日中的华北人民以极大鼓舞，打击了当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东江农民勇揭竿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广东省海丰、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就在彭湃的领导下开展得生气勃勃，动摇了当地封建统治的根基。大革命失败时，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该区农民起义，夺取了政权，不久撤至山区。

1927 年 8 月 29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抵达香港，于次日召开广东省委会议，制定了广东暴动计划，提出了明确的纲领，部署了起义工作。22 日，广东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东江必须立即举行广泛的暴动，为叶、贺内应，两江（北江、西江）和南路亦须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以牵制李（济深）、黄（绍竑）部队”的指示，加快了组织全省武装起义，迎接南昌起义军入粤的工作。9 月上中旬，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接应南

昌起义军南下东江地区，中共广东东江地区党组织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军和农民起义，占领了两县城，并建立了两县临时革命政府。不久在敌人进攻下，转入农村坚持斗争，10 月，南昌起义军余部 1300 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2 师，增强了该区的武装力量。

10 月 30 日，东江党组织在工农革命军第 2 师配合下，乘粤桂战争爆发之机，领导海丰、陆丰农民和农民群众再次组织起义，并迅速占领了两县全境，至 11 月上旬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11 月中旬，在彭湃须导下成立了两县苏维埃政府，开始分配土地，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1928 年初，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 4 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壮大了该区的武装力量。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建立了数县相连的游击区，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后来，由于东江特委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红军在进攻普宁、紫金中受挫，部队减至 500 余人。5 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敌人进攻下失败，少数人退到五华、丰顺间的莲花山区，坚持革命斗争。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的事实表明，在靠近敌人中心城市及濒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占领城镇，是无法保存革命力量，建立较巩固的根据地的。

中原逐鹿起确山

1927 年 9 月下旬，中共豫南特委在信阳成立，王克新任书记。豫南特委根据省委暴动计划，确定以中共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确山县、信阳县为重点。10 月初和下旬，分别组建了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和四望山特别支部，负责发动武装起义工作。中共驻马店办事处成立后，建立了一支以共产党员及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的农民武装和暴动指挥部。

11 月 1 日，中共驻马店办事处主任李鸣岐、组织委员马尚德（杨靖宇）等根据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和豫南特委的指示，发动领导了确山刘店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成确山农民革命军，马尚德任总指挥，李鸣岐任党代表。11 月 3 日，成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派很快集中兵力，分三路向刘店进攻。为避敌锋芒，农民革命军主动转移到刘店以东和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分粮食，消灭地主武装，在汝南、确山、信阳边区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游击区。次年春，农民革命军遭到优势敌人的进攻，被迫转移，一部转至大别山开展游击活动，一部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确山农民起义，是中原地区农民起义的先声。它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农民革命军，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游击活动，同黄麻起义军南北呼应，予当地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有力打击。

1927 年 11 月初，中共信阳四望山特支将当地农民武装，改编为信阳农民革命军，王伯鲁任总指挥。11 月下旬举行起义，首先攻打杨家寨，接着奋战黄龙寺，击溃反动民团千余人的进攻。后在四望山与确山农民会合，共同作战，很快在信阳西南形成了一块红色区域，并建立了临时工农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在敌人进攻下失败。

风展红旗战黄麻

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地瘠民贫，广大农民不甘忍受封建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该地建立了基层组织和农民自卫队、义勇队、自卫军等农民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不畏白色恐怖领导农民自卫队和人民群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1927 年 9 月，中共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委执行《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分别领导数千农民起义，因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进攻下失败。中共湖北省委，十分重视黄麻地区的秋收起义，先后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及王志仁到黄麻地区，加强起义的领导。11 月 3 日，省委代表及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分子在七里坪召开会议，成立了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委和以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革命委员会，讨论了黄麻起义的问题。11 月 14 日，中共黄麻区委乘李宗仁、唐生智两派军阀战争之机，再次领导黄麻两县农军和农民 2 万余人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接着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并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共 300 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正副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后来，国民党第 12 军一部偷袭黄安县城，鄂东军实行突围，潘忠汝等在战斗中牺牲，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至黄陂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方圆仅六七十里，东西两面有高山屏障，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适于力量弱小的革命武装生存发展。

1928 年 1 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4 月，第 7 军乘黄麻地区国民党第 12 军教导师撤回河南之机，返回黄麻地区，开展游击战争。7 月，第 7 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1 师。

黄麻农民起义，是鄂豫皖边区最早、影响最大的起义。它所建立的革命武装，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同后来商南农民起义建立的红 32 师、六霍起义建立的红 33 师一起转战大别山区，为红四方面军的组建和鄂豫皖苏区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工农运动曾有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深刻的影响。从 1927 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起，广州李济深国民党政府紧跟蒋介石反革命步伐，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占据和控制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从各方面向工农进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广州党组织领导广大工人举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并成立各种工人武装，为反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维护工农群众在大革命中所获得的各项政治经济权益进行顽强的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 8 月 11 日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以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为委员的南方局，并在南方局之下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以指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的暴动事宜。同时，决定以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8 月 22 日，中共中央致信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指示在东江地区立即开始广泛的暴动，发表政治口号，为叶挺、贺龙部队南下作内应，为牵制李济深、黄琪翔军队起见，对西江、北江及南路亦须有军事动作和农民暴动等。9 月，中共中央致信南

方局并广东省委，指示要广泛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民团和驻军的枪械，暴动农民应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际，叶、贺应与农军会合直奔广州，沿途武装农民，扩大军队，一直杀去；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地号召工人、手工业者、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及警察的武器；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和工人团体代表，召开革命会议，选举中国临时革命政府。

这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组织湘鄂粤赣等省秋收起义的同时，对白色恐怖下的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改选和重建，以纠正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建立坚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经过中央和全党的努力，终于使党渡过了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但是，在革命转折的关头，党内从八七会议后出现的“左”倾情绪继续滋长起来。这种倾向，从上述指示中已有所反映。

9 月下旬，张发奎率其所部第 4 军等部队，乘广东的桂系军队在东江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江西进至广州，企图夺取广东地盘。中共广东省委利用张发奎同李济深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与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会、农会，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并展开了用强力夺回工会，对抗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工会的群众斗争。面对日益发展的工农群众势力，张发奎撕去“左派”的外衣，在广州市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广大群众看清了张发奎新军阀的面目，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整个广州市充满着革命的气氛。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中共中央致函省委，指出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政权的计划，虽然暂时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但是要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领导他们继续暴动，夺取县政权，杀土豪劣绅和政府官吏，分配土地，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夺取全省政权。

10 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桂系李宗仁部同唐生智部的战争爆发。11 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争夺广州的矛盾激化，对桂系在广东的势力发动突然袭击。这一事件使广东局势骤然紧张。桂系重要首领黄绍竑迅速集中兵力于广西梧州地区，准备向广东进攻，倾向于桂系的粤系军阀陈铭枢部和陈济棠部，也乘机由广东汕头等地向广州推进。为此，张发奎急忙将其主力调往广州西部的肇庆地区以及广州东面的石龙地区进行防御，李福林第 5 军分别驻在韶关、江门等地。这时，在广州的张发奎军队，除了被共产党掌握的第 4 军教导团、警卫团外，只有第 4 军军部、炮兵团、新编第 2 师第 3 团和警察武装，以及一些招收新兵的单位，兵力比较薄弱。

这时，广东海陆丰起义军民，占领了海丰、陆丰全县，广州工农运动进一步恢复。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 4 军教导团 1200 多人中有 200 多名共产党员，广大官兵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行为极其愤慨，革命情绪高昂；第 4 军警卫团团长是共产党员，许多士兵倾向革命，但是，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广州外围的敌情还很严重。

李宗仁同唐生智的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实行总暴动政策，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广州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广东政局最近又发生了变化，表面是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而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强调要抓住有利时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

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统治。”

根据广东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于 11 月 26 日，抓住粤桂军阀战争、广州敌人防守空虚的有利时机，举行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起义计划。召集全体工会一致行动，筹备总同盟罢工；组织赤卫队筹备武装暴动；加紧对张发奎军队内部的工作，使暴动时有一部分军队投到工人方面；组织市郊农民的暴动等。广东省委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聂荣臻参加了起义组织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在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中广泛动员，揭露了国民党残酷镇压工农的暴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同时，按照军队样式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7 个联队和 2 个敢死队。

起义原定于 12 月 13 日举行，因起义消息被汪精卫、张发奎获悉，张调其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到广州，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同时查禁工人运动，在广州实行戒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决定起义提前两天，于 11 日举行。

11 日拂晓，在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率领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 3000 多人，按照军事委员会的计划，向广州市内各要点突然发起进攻。在广州市两万多名起义群众的配合下，起义军迅速解决了市区要害机关公安局、卫戍司令部、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财政厅、电话局、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及粤汉、广三、广九火车站，控制城北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广州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也参加了起义的行列，积极配合市内起义军作战。当日，除了珠江长堤第 4 军军部据点外，珠江以北广州市区的国民党军政势力均被肃清，起义军民缴获火炮 20 多门、各种枪数千支及大批物资。张发奎、黄琪翔险遭生俘，广州公安局长朱日晖乘装甲车狼狈而逃。

起义的当天上午，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工运领袖苏兆征为政府主席（苏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以杨殷、彭湃、恽代英为政府成员，并发表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件，文件提出，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苏维埃的武装由 3 个军组成。第 1 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 2 军为海陆丰农民赤卫军，第 3 军以教导团为骨干，加上其他武装组成；禁止国民党活动，取消一切组织，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全广东农民即刻暴动起来，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富农，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一切兵士和革命的军官带领武装到红军方面来，逮捕并枪决一切反革命军官，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等。

为了扩大影响，中共广东省委于 12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广州暴动的通告》，通知各地党部，广州暴动已经爆发，占领了国民党党政军等重要机关，市区工人已实行总同盟罢工，市郊农民已进入市区，反动军队第 4 军在市内者已被缴械，现已成立苏维埃。党应坚决领导工农兵起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增加工人工资，武装工农，成立红军，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兵士，消灭军阀战争，联合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各地接此通告后要普遍宣传，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向广州进展，保卫广州暴动的胜利。中共中央于 12 月 14 日发布了《为广州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宣布广州暴动已将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打倒了。广州四乡的农民已经起来参加革命的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尤其是海丰、陆丰等东江一带

的农民暴动。早已得到胜利。全广东的工农兵士都在剧烈的奋斗，要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并号召全国的工农兵，赶快团结、武装起来，以革命斗争和暴动，在各地打倒一切反动势力，创造真正民主独立的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时，共产国际也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指出：“广州在革命斗争之中，顿开一新的局面，广州的工农夺取了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鲜红旗帜已经在南部中国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来了。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

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和强敌环围情况下发动的，起义后本应主动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在起义胜利的当晚叶挺曾提出迅速撤离广州，到农村去坚持斗争的正确主张。但是由于广东省委在当时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影响下，企图坚守广州，以会合各地城乡起义力量，进而夺取广东政权，拒不采纳叶挺的意见，致使起义军民陷入优势敌人围攻的严重境地。

广州起义一举夺占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建立了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极大地震动了中外反动派。从起义成功的第二天起，张发奎等即指挥从江门、肇庆、韶关调回的第 4 军等部，以及驻广州珠江南岸的国民党第 5 军李福林部，共 7 个团以上的兵力，从四面向广州起义军民疯狂反扑。在广州的美英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也积极支援国民党军队攻击起义军民，起义军民同仇敌忾，在观音山、公安局等主要阵地，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的争夺，予敌以重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于 12 日下午参加在西瓜园召开的群众会议，归途中，遭敌人袭击牺牲。起义军民经过近 3 天的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广州于 13 日 15 时被敌人占领，起义军逐渐撤退，工人赤卫队因未来得及撤出，有 1000 多人英勇牺牲。起义军 1200 多人撤出广州，后经花县、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陆丰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师，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发袁国平），同当地工农武装一起，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广州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他们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者，并殃及普通群众，放火焚烧民房，公开抢劫民众财产，强行解散工会、农会，压迫工农运动，残酷剥削工人、农民，封闭苏联领事馆，逮捕其工作人员，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中写道：“残酷的反动派以屠杀四千英勇战士为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严遭拷问、嘲弄，而后尽被斩决、烧死。在广州被诬为共产党员者不知有几千上万，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农民者被诬为‘民众的公敌’，而胜利的军阀，张着血污的口残笑着假借民众的名义，他们的凶残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他们的凶残掀动了残酷血潮扑入广州。兴所谓‘讨伐’之师正向广东开拔，他们的目的在于扑灭广东的一切民众运动，军阀们正在庆祝欢迎。”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政权的大胆尝试，充分显示了党和人民群众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它虽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但是起义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所表现出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深远的影响，给予处在革命转折关头的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并为人民武装斗争产生了一批骨干力量。经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美物候新，五百方圆无纤尘。

革命摇篮根不动，人民永远掌乾坤。

这首小诗，充分反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伟大作用，以及革命者对它的仰慕。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等县。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为落脚点？这是毛泽东雄才伟略的决策。

根据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决定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在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占据着中心城市的形势下，搞城市起义一举取得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必须把革命重点转向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为此，在军事战略上必须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革命的落脚点，形成武装割据的态势，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而井冈山对实行这种割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第一，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地处湖南、江西两省的边界，远离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两省军阀各属不同派系，互相提防，行动较难统一。第二，该地区革命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这里大部分县都有过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过农民协会和农军，毛泽东赞扬过的被反革命诬为“痞子运动”的农民革命，这里都进行得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革命虽遭破坏，但党的力量还存在，在井冈山，还保存着王佐、袁文才两支农军。第三，从军事上考虑，井冈山方圆 270 余公里。它位于江西宁冈、永新、遂川和湖南酃县 4 县之交，北麓是宁冈茅坪，南麓是遂川黄坳，东麓是永新拿山，西麓是酃县水口，山上重峦叠嶂，深涧纵横，林海莽莽，云雾缭绕，巍峨险峻。井冈山上有险关要隘五大哨口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是上井冈山必经之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主峰井冈山外，还有莲花、茶陵交界的九陇山等要地，山岭连绵，林木茂密。井冈山地区在军事上退可守，进可攻，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这里物产较丰，红军在此地落脚，也便于积蓄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了使革命从遭受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到茅坪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唐生智两集团间爆发战争，两湖及江西的国民党军大多都卷入了这场混战。井冈山地区敌人仅有地方保安队和挨户团等。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击反动武装，发动群众。

1927 年 11 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 1 营由井冈山前出茶陵，攻占了县城，建立了中共茶陵县和县工农兵政府。12 月，因强大敌军进攻主动撤出。

1928 年 1 月，工农革命军第 1 团又攻占了遂川县城，建立了人民政权。

同时，毛泽东派人与边界各县地下党取得联系，帮助恢复了中共永新、宁冈县委，在井冈山教育改造了王佐、袁文才两支农军等，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2 团。

1 月上旬，万安农民占领了万安县城。中下旬，敌军一部向万安“进剿”，占领了宁冈县新城。毛泽东得知此情报后，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充分准备，于 2 月 18 日，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在赤卫队配合下，全歼守敌，攻占新城。到 2 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

1928 年 4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1928 年 10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红 5 军突破敌军重重包围，于 12 月 10 日到达井冈山宁冈，同红 4 军会师。井冈山成为了革命力量的落脚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和胜利！

怀玉山区风雷激

赤旗高举在横阳，路隘林深据一方。
星火燎原先拓土，波了良推进继开疆。
南征北战思谋费，建政培军运筹忙。
就义从容身首异，清贫留下万年芳。

这首七律诗不仅歌颂了革命烈士方志敏的高风亮节和光辉业绩，而且记述了弋横起义的惊心动魄的英雄篇章。

1928 年 1 月，以江西农民运动领导人方志敏为书记的中共赣东北五县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是在华东地区一次很有影响的武装起义。赣东北包括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余江、万年、乐平、德兴等 10 余县。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山区，交通不便，地形比较险要，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动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并同黄道、邵武平会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干部会议，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发动农民举行年关起义。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确定了起义的组织，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成立团、排、班。规定了起义纪律。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书记，黄道、邵式平为委员的工作委员会领导起义。1 月上旬，方志敏等领导农民革命团首先在横峰娄底蓝家村，解除了国民党县政府警察的武装。接着弋阳等地农民立即响应，数日之内，起义区域扩大到纵横各百余里。起义后，成立了中共弋阳中心县委，辖弋阳、横峰、德兴三县，并组成了游击支队。5 月，弋阳、横峰分别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农民起义武装，发动人民群众镇压反动分子，打土豪，烧田契，建立村、乡、区苏维埃政权。农民群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弋横起义予国民党以很大震动，国民党上海《民国日报》惊呼“弋横共产党大闹暴动图谋大举”。在国民党进攻下，由弋横起义武装组成的土地革命军退至磨盘山地区，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在弋横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赣东北地区的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的部分乡村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

弋横农民起义，在赣东北地区树立了一面旗帜，予当地国民党反动派以

有力打击，起义军组成的土地革命军，为尔后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 1 团和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曾对方志敏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予以高度评价，称之为“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湖南大地起狂飙

1928 年春，由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起义，是发生在中南地区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1927 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在城镇和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暴动队、赤卫队，为起义作了准备。1928 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至湘南，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于 1 月 12 日智取宜章城，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帷幕。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并组建了宜章农军。这时，国民党军许克祥独立第 3 师由广东乐昌地区北出，直扑宜章。为待机歼敌，工农革命军和农军主动撤出宜章城，向黄沙堡方向转移。国民党军占领宜章城后，即向南追击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在农军配合下，在岩泉、栗源地区击溃独立第 3 师一部，乘胜追至广东坪石，将其主力打垮，共歼敌 1000 余人，并重占宜章城。接着建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

坪石战斗的胜利和宜章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振奋了湘南人民的斗志，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了支援农民起义，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应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要求，由宜章挥师北上，于 2 月 4 日占领郴县城。尔后分兵协助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民占领这几座县城，并在这些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在此期间，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大部分地区农民和常宁县水口山铅矿工人，也纷纷起义。3 月中旬，在郴县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陈佑魁任主席。湘南起义胜利后，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资兴 5 县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 3、第 4、第 7 师和两个独立团，共 8000 余人。

3 月下旬，国民党军以 7 个师的兵力向湘南地区进攻。这时，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湘南特委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州）宜（章）大道两侧 5 里内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等极左口号，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更主张大烧大杀，特委确定了杀尽阶级敌人，烧毁敌人巢穴的政策，致使工农革命军在湘南无法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当机立断率工农革命军于 4 月上旬撤出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不久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在向井冈山开进的途中，已接任陈佑魁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的杨福涛不愿去井冈山，并不听陈毅等劝阻，坚持带领特委机关人员回衡阳领导群众斗争，结果在耒阳、安仁边界被敌人包围，杨福涛和特委机关三四十人全部遇难。

湘南起义，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 5 县及临近地区包括 100 万以上人口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保存与发展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

年关起义洪湖滨

1928 年初，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人周逸群、贺龙等奉中央指示由上海赴湘西北组织革命武装，途经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和罗迈（李维汉）根据斗争需要，确定由柳直荀（未到职）、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鄂西南特委，前往监利、石首等县组织领导荆江两岸的武装起义。周、贺等人于 1 月 20 日到达新堤。在观音洲，贺龙以拜客 ” 名义，缴了团防局的枪支弹药，次日到达监利境内，同贺锦斋会合后，随即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27 日，周、贺在下车湾主持召开了有石首中心县委及监利、沔阳、华容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在这几县组织年关起义，并致函中共鄂中特委，相约会攻监利县城。

中共鄂中特委于 2 月 1 日，将萧仁鹄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5 军、吴仙洲率领的石首农民革命军、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9 路军，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2 月初，在贺龙的指挥下，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农民武装，首先在监利境内发动攻势，连续打垮了七八个团防局，接着渡江南下华容，消灭土匪百余人及团防一部，后转进石首，策应石首东山起义。贺锦斋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石首农民武装配合下，攻势凌厉，连克数镇，一度袭击石首县城，消灭百余人的土匪武装，缴获国民党军骑兵团五六十支枪。工农革命军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消灭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武装 2000 余人。第 49 路军发展到近千人。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工农革命军本应向鄂中、鄂西广大农村发展，但鄂西南特委由于受 “ 左 ” 倾盲动主义和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作出了集中兵力攻打监利县城的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不克，使有利的形势发生逆转。

2 月下旬，中共鄂西南特委在石首焦山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在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去鄂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会议最后决定分兵开展游击战争。周逸群、贺龙率贺锦斋等 10 余人按原计划去湘西组织湘鄂边武装斗争。萧仁鹄率鄂中武装返回监沔地区。吴仙洲部与贺锦斋部交石首中心县委领导。

历时月余荆江两岸年关起义，虽然一度取得很大胜利，开展了斗争新局面，但热衷于打富济贫，没有积极发动群众，更不懂得建立根据地，又盲目地进攻城镇，使有利的革命形势很快丧失。留下来的部队，由于失去统一领导和指挥，分兵游击，受到严重损失。但它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斗争局面，为后来创建红 6 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重回桑植打红旗

桑植位于湘鄂边地区，反动统治较弱，系贺龙的家乡，有旧的游击武装可以争取，地理条件有利，进可东出湘鄂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贵州，退可据险固守，图存发展。周逸群、贺龙等 10 余人在 1928 年春节前后参加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后，于 2 月 20 日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贺龙一行在途中遇到不少团防武装和驻军的首领是贺龙当年的部下，其中有些准备带着队伍投奔贺龙。贺龙、周逸群鉴于这些部队成分各异，未予收编。2 月 28 日，贺、周等到达桑植县洪家关，遂着手建立革命武装。中共湘西北特委在当地争取地方武装 3000 余人，枪 700 余支，组成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于 3 月发

动武装起义，占领桑植县城，并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开展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4 月初，贺龙前往湖北鹤峰县筹款，国民党乘起义武装立足未稳，派第 43 军 1 个旅向桑植和洪家关进攻。新建立起来的工农革命军由于成分复杂，未来得及整顿和改造，经过梨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战斗，虽予敌以打击，终遭失败，大部溃散。周逸群转往洪湖地区，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贺龙收集失散部队数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6 月，国民党从桑植县城西撤，工农革命军乘机返回桑植地区，一举歼敌 1 个辎重连，击毙敌军旅参谋长，士气大振。通过整顿和改编，部队得到进一步纯洁和巩固，并很快发展到 1500 余人。

桑植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游击区域，有力地鼓舞了湘西北地区人民的斗志，为尔后建立红 4 军和创建湘鄂边苏区，奠定了基础。

闽西大地刀枪举

1928 年春、夏的闽西地区农民起义，不仅涉及很大的范围，而且颇有影响。闽西地区，武夷山蜿蜒其间，境内重峦叠嶂，山深林密，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回旋区域较大，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基础好，宜于发动武装起义和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大革命时期，中共闽西党组织，在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南昌起义后，中共闽南临委获悉起义军正向赣南挺进，即派罗明赴闽西组织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军在上杭期间，部队进行打土豪和筹款帮助建立中共党组织，并拨出一批枪支支援地方武装。这给闽西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很大鼓舞。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共龙岩临时县委于 3 月 4 日发动后田起义，收缴了土豪劣绅的枪支，接着召开群众大会，龙岩临时县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代表县委宣布分配田地，并焚毁了一些契约、帐簿，开仓分粮。在后田起义的影响下，后田附近的其他乡村也纷纷起义。9 日，国民党军 500 余人分两路向后田进攻，起义队伍组成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

中共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于 3 月 8 日领导长乐乡及其附近农民起义，攻克平和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无辜民众。接着，起义武装在敌人反扑下，转移到闽粤边界，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永定县委负责人张鼎丞等于 6 月中旬领导永定农民起义，胜利后，一度攻入永定城，并建立了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

为了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斗争，中共永定、龙岩、上杭、平和四县县委还召开了联席会议，组成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别区委员会。8 月，龙岩、上杭、永定等县农民起义武装在溪南集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第 19 师，同时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不久，第 19 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攻下，连打硬仗，遭到严重挫折，余部编为红军游击队，在当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闽西地区的农民起义，涉及闽西数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该区的反动统治，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它组成的红军游击队，为后来红 12 军和闽西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伟大的井冈山会师

两军兵聚山冈，破天荒。星火燎原南北起苍黄。旌旗展，工农显，举刀

枪。道路通天红日耀家邦。

这首小词《相见欢·井冈会师》生动记述了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

毛泽东、朱德互派“特使”，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又经过湖南省委的联系，朱德准备发动湘南起义。毛泽东对这一行动准备给予策应、支援。这是在井冈山会师前，两军密切配合的一次作战行动。在毛泽东率部接应掩护下，朱德部队在湘南起义后，顺利撤离，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两军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会师。

朱德率部进入湘南后，施巧计夺取了宜章县城，尔后策动和领导了湘南大规模武装暴动。鉴于国民党军队势力从多方向湘南集中反扑，朱德、陈毅严厉斥责了湘南特委“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和主张，决定率部向井冈山退却。

3 月中旬，毛泽东进至酃县西部三口圩和南部中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时刻注视着湘南形势的发展，当湘粤两省敌军形成向湘南夹击的形势后，毛泽东按湘南特委的要求，进入湘南地区。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去接应朱德、陈毅上山：一路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 1000 人，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监视位于汝城的胡凤璋部，防止敌军经桂东突进酃县，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并担负从南侧掩护湘南农军撤退的任务；另一路为第 2 团，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接应掩护湘南农民撤退。毛泽东还派特使毛泽覃带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3 月 29 日，朱德在表阳骜山庙整顿队伍，进行向井冈山转移的战斗动员，他操着沉重的四川口音，大声说：“这次进入湘南取得了很大胜利，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了。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工农武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我们要百倍警惕，选择更有利的时间、地点消灭他们。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山谷中，激励鼓舞了工农红军战士。他们精神抖擞地上路了——向井冈山进发。

4 月 5 日，朱德率部占领安仁随后进入茶陵，在毛泽覃率领的特务连接应下，到达酃县的沔渡。湖南敌军指挥部于 4 月 13 日命令第 8 军第 1 师经茶陵抢占酃县，但为时已晚。

在郴州的陈毅接到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刻组织湘南各县党政机关向东撤退，4 月 8 日到达资兴县城，恰巧同井冈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2 团会合。不久，黄克诚带着永兴的 800 余农军也赶到资兴的彭公庙。

在桂东沙田的毛泽东为掩护湘军撤退，4 月 6 日向汝城进发，并攻占了汝城，以牵制敌军。中旬，在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肖克领导的湘南起义军宜章独立营 500 多人会合。

4 月中旬，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主力一部和湘南农军第 3 师、第 7 师等，全部到达酃县。由于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接应，各路革命军密切配合，顺利地撤离了湘南。队伍汇合到一起，人欢马嘶，显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势。

朱德、陈毅和井冈山革命军第 2 团在酃县沔渡会合后，何长工又见到了

身材结实的朱德。朱德一心想见到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何长工：“毛泽东什么时候能到？”何说：“两天左右可能会到宁冈。”然后，何与袁、王带第2团先行赶回宁冈，准备房子、粮食，迎接两军会师。

朱德为掩护毛泽东部返回，以一部控制酃县至宁冈的必经之地沔渡，主力随何长工后进入宁冈砻市。4 月中旬末，毛泽东回到宁冈砻市。几位历史巨人盼望已久的会面，两军大会师终于来到了。

4 月下旬的一天，井冈山风和日丽，山清水秀，松涛声声，欢迎来自各方的革命队伍。在砻市龙江书院，人们欢声笑语。朱德、陈毅听说毛泽东即刻就到，早已在门口等候迎接。

毛泽东一到砻市，听说朱德、陈毅已到，顾不得洗整一下，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老远望见书院门口一群人等候，毛泽东问何长工，“哪位是朱德，哪位是陈毅？”何长工立即回答，前边的那位是朱德，左边稍后的是陈毅，后边是王尔琢。

毛泽东满面笑容，向他们招手。朱德抢先几步，两只巨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时，毛泽东 35 岁，朱德 42 岁。两人从此开始了为中国革命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战友生涯。井冈山会师，标志着红军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 月 4 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在龙江西岸河滩上，用几十只木桶和门板搭起了主席台，主席台两侧红旗飘扬，会场上队伍整齐威武，场四周群众人声鼎沸，喜气洋洋。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当陈毅宣布庆祝会师大会开始时，嘹亮的军乐响彻山谷，鞭炮齐鸣。人们高呼口号，欢呼两军会师。随即，陈毅宣布了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的决定。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以深远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简称红 4 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井冈山根据地工农革命军和南昌起义军余部以及湘南农军合编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无产阶级骨干武装。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江西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合师后，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不久，毛泽东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5 月下旬，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 30 团和第 33 团返回湖南开展游击战争。军部所辖的部队，有以南昌起义军余部、宜章农军、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和袁文才、王佐部分编的第 28 团、第 29 团、第 31 团和第 32 团 4 个团，全军 6000 余人。接着，第 4 军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当时称 4 军，是为了保持国民革命军第 4 军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和“铁军”的英名。

红 4 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利用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间的矛盾，对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实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在人民群众和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积极支援下，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

次“进剿”和“会剿”，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 4 军在斗争中，不仅创造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掌握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和运动歼敌的手段，龙源口一战，曾取得歼敌 1 个团、击溃 2 个团的重大胜利；同时，还提高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及党的组织等项本领；并且在“三湾改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民主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宽待俘虏等建设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建军原则。11 月，红 4 军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1929 年 1 月，红 4 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地区，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拦阻，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敌第 15 旅大部分，翻过武夷山。3 月中旬长汀一战，歼灭福建省防军第 2 混成旅，打开了闽西斗争的新局面。这时红 4 军整编为 3 个纵队，以后又成立了第 4 纵队。此后，红 4 军利用蒋桂战争爆发和江西、福建国民党军力薄弱，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执行前委提出的开辟赣南、闽西 20 余县的方针和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在武夷山东西几十个县的广大区域内，以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和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为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斗争。4 月，红 4 军攻占兴国、宁都后，赣南苏区初步建立。5 月下旬，红 4 军再次入闽，取得了三打龙岩和上杭战斗等胜利，歼灭福建省防军第 1 混成旅和暂编第 2 旅。闽西苏区迅速建立。在这个过程中，红 4 军还曾有过闽中行动和广东东江行动。在此期间，军设政治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朱云卿任参谋长。

192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项决议，确立了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古田会议后，红 4 军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30 年初，红 4 军在吉安的水南、值夏地区歼灭国民党独立第 15 旅大部。此后，红 4 军以 3 个月为期，实行分兵，按照前委提出的“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和“傍着发展”的方针，大力经营赣南、闽西苏区，取得很大成绩。3 月，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的赣西南苏区成立。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后来发展为统一的中央苏区。6 月，以红 4 军为骨干，与赣西南地区 1 月成立的红 3 军和闽西地区 4 月成立的红 12 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军团的成立为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和反“围剿”，准备了条件。

红 4 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确领导下，在作战、建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取得了辉煌成就，它是中国红军中的劲旅和榜样。

此外，湘鄂边和鄂豫皖边也各有红军第 4 军。1928 年 7 月，湘西北桑植起义保存的部队发展到 1500 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贺龙任军长，在湘鄂西坚持游击战争。1930 年 7 月，该军与红 6 军会合，编为红军第二军团，红 4 军改称第 2 军。1931 年 1 月，鄂豫皖苏区红 1 军和红 15 军会合，合编为红 4 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下辖 2 个师，1.2 万余人。后几经改编，红四方面军中一直保留红 4 军番号，并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反“围攻”和长征等重大军事行动。

江海之滨干戈起

1928 年 4 月底 5 月初，中共江苏江北特委领导的通如海泰农民起义，也是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一次声势较大的起义。该区位于江苏中部，濒临黄海和长江，靠近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上海，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国民党统治稳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一定声势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

泰兴、如皋、靖江、海门、南通等县数万农民起义后，首先打掉了如皋、泰县两县公安分局和驻防警察机关，然后向各地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分粮食，烧契约，镇压土豪劣绅，并且提出“土地归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在如皋成立了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遭受挫折后，中共南通特委（后改称通海特委）领导各县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一些游击小组和游击队，结合群众斗争，积极开展活动，使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壮大。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步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1930 年 4 月，两个支队合编为红军第 14 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不久，中共江苏省委“二大”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的目前“统治阶级正在日趋崩溃，而革命运动正在继续发展走向高潮”，“党领导群众斗争的总策略，必须坚决运用进攻的路线”，并指责所谓不动主义是阻碍农民运动的最普遍危险的倾向等“左”倾错误观点的指导下，红 14 军盲目进攻敌人的坚固据点，战斗接连失利，何昆牺牲，最终遭到失败。

通如海泰农民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在敌人严密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它所建立的革命武装在临海濒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两年之久，为党和红军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潼南兵暴动四川

1928 年 6 月 6 日，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破坏反革命军队，配合农民起义的指示，四川边防军第 2 混成旅地下党组织在潼南双江镇发动该旅两个团兵暴。大革命时期，刘伯承等领导的沪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瞿联承团被国民党第 28 军李家钰师收编，后扩编为四川边防军第 2 混成旅，瞿联承任旅长。沪顺起义时，该部的共产党组织损失较小。1928 年在瞿部任秘书的共产党员李鸣珂，奉中共中央指示担任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武装起义。为加强瞿部的领导力量，李鸣珂派共产党员赵子文、范弘先、李载甫、李伯容等到该部，并发展第 10 团团长刘文仕、11 团团长秦仲文为中共党员。部队在驻地射洪县太和镇配合地方党组织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李家钰为切断该部与地方共产党的联系，将这个旅调驻潼南双江镇，并派人严加监视。

此时，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该旅适机起义。为加强起义领导，派负责同志张秀熟、任逖犹等到该旅，帮助建立党的支部和特支。同时，加强对官兵进行革命教育，发展党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起义作了准备。这时，旅长瞿联承觉察情况异常，密报李家钰。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军官 20 余人到该旅基层任职，决心对秦、刘两团实行武力整顿。中共党组织为粉碎敌人的企图，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6 月 6 日晚，起义的信号枪打响后，全旅一齐行动。瞿联承仓皇逃走，李家钰派去的 20 名军官除 1 人漏网，均被击毙。起义军收缴了 40 多担子弹和 5 担多银元。起义后，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独立第 1、第 2 旅，由刘文仕、秦仲文分别任正副司令，由

特支书记赵子文任前委书记。为防止李家钰部的进攻，起义军从双江转移到璧山屈家沟。计划待部队短暂休整后，即渡长江向酉西、秀山方向转移，争取与湘西的贺龙部会合。

潼南起义，一举从国民党营垒中拉出一个旅，予国民党反动派以很大震惊。李家钰勾结刘湘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攻。刘湘以其主力一部防守长江，堵住起义军东去的道路，以何光烈部封锁嘉陵江渡口。起义军前委在严峻形势面前，认为，目前敌我力量悬殊，进退失据。为保存实力，待机再举，决定起义军暂时投奔刘湘。已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马上转移，未暴露的继续隐蔽留队工作。李鸣珂、赵子文等撤离部队，转移到遂宁、射洪等地，部队由刘文仕率领接受刘湘改编。刘将该部改编为警备师，何光烈任司令，以邀请刘文仕到城内开会为名，以伏兵将刘乱枪打死于重庆吴公岩。刘牺牲后，刘湘对该部重行整编。留在该部的共产党员处境危险，组织决定，秦仲文、任逖犹等撤离部队。这次起义，是西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兵暴，在强敌的围攻下，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给国民党以打击，并为尔后的兵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没有红军接应和革命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发动兵暴最终是要失败的。

七溪岭上斗二杨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红军第 4 军后，接连取得五斗江及草市坳战斗的胜利，军威大振，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迅速发展。这使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十分恐慌。

6 月，国民党赣军调集第 9、第 27 师共 5 个团的兵力，以第 9 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企图将红军第 4 军歼灭于宁冈地区。湘军第 8 军第 2 师亦由平江调到攸县策应赣军的行动。红军根据边界特委和红 4 军军委的决定，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宁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并以赤卫队、暴动队积极活动，迟滞和袭扰敌人。

6 月中旬，国民党军占领永新城后，以 3 个团兵分两路向宁冈方向推进。22 日，国民党左右两路军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老七溪岭进攻宁冈。红 4 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决定，以第 29 团和第 30 团第 1 营占领新七溪岭，阻击来犯之敌，以第 28 团向老七溪岭出击，迂回敌人侧后，在阻击部队配合下，求歼国民党军一部或大部，以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

23 日拂晓前，红军各部分别准时到达指定地区，严阵以待。战斗首先在新七溪岭打响。红军指战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战至当日上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左路 1 个团的多次猛烈进攻，顽强坚守制高点。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军长手提机关枪赶到望月亭，激励士气，组织火力压制敌人。

与此同时，红军第 28 团在团长王尔琢率领下，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国民党右路军 2 个团先头部队多次攻击。战至午后，终于夺占了制高点。这时，埋伏在白口武功潭山上的红军第 32 团也向白口敌前线指挥部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线指挥中枢遭到突然袭击，猝不及防，顿时乱了手脚。红军第 28 团趁势猛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红军衔尾追至白口，歼敌一部，旋即直插龙源口，截断了国民党军左路的退路。此时，红军第 29 团等部将国民党军左

路击溃，追至龙源口，同红军第 28 团前后夹击敌人，大获全胜，并不待敌人喘息，一鼓作气，收复永新城。随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进入全盛时期。

龙源口战斗，国民党军被歼灭 1 个团，击溃 2 个团，损失枪约 800 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被打破。从此，“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长）的歌谣在井冈山根据地不胫而走，成为人民群众的笑柄。

平江起义壮红军

1928 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湘军独立第 5 师中秘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该师第 1 团团长彭德怀也加入了共产党。6 月，独立第 5 师奉何键之命从南县到平江地区担负“清乡”任务。部队到达平江后，士兵们目睹反动派残害工农的暴行，在党的秘密工作下，由同情工农，发展成为倾向革命。7 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特委，并同独立第 5 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

7 月中旬，中共南华安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敌人发现独立第 5 师第 3 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后，下令立即逮捕。在此紧急情况下，滕代远、彭德怀等毅然决定立即率部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公开士兵委员会，团结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起义；发动闹饷，作为起义的引线；通知嘉义 3 团 3 营营长黄公略和岳州随营学校副校长贺国中于 7 月 22 日率部来平江参加起义；分工由滕代远负责政治鼓动，彭德怀负责解决反动武装，邓萍起草宣言、标语、传单、布告等。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准备，部队群情振奋，强烈要求补发欠饷。处决反动军官，解散残害民众的清乡委员会，消灭反动军警和挨户团。7 月 22 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 1 团 800 人在平江城揭起义旗，一举解决了城内国民党军警 2000 余人的武装，缴枪 1000 余支，占领了平江城。黄公略领导驻嘉义镇的第 3 团第 3 营一部，贺国中领导的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宣布起义，并开赴平江同第 1 团胜利会合。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 5 军第 13 师，辖 3 个团，共 2000 余人，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平江起义的枪声，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震动。湖南的《大公报》报道称：“平江驻军与共产党在平江组织苏维埃政府”。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惊闻“平江匪势，日甚一日，刻甚一刻”等语后，惊恐至极，大骂独立第 5 师师长周磐无能。接着，国民党军集中 6 个团的优势兵力，向平江进攻。起义军激战一日，撤出平江城，转战于湘赣边地区，部队减员较大，遂将 3 个团 700 余人编为 5 个大队，后又扩编为 10 个大队。11 月，红 5 军留一部由黄公略领导在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于 12 月 10 日到达宁冈，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4 军会师。

平江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革命士兵起义，它一举在国民党军中拉出 1 个多团的部队，给予国民党军队以分化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推动了湘鄂赣边界斗争的发展。

黄洋界上炮声隆

思情浓，恋情浓，谁晓思情似海汹。耳边枪炮隆。桐木崇，黄洋崇，仰视峰高拄九重。井冈天下雄。

这首小令《长相思·黄洋界》不仅表达了对黄洋界战斗历史的景仰，也抒发了对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感怀。

黄洋界保卫战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第 4 军一部在江西井冈山地区进行的一次防御战斗。1928 年 8 月下旬，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以 4 个团的兵力，乘红 4 军主力远去湘南之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心坚守井冈山。第 31 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部署了作战。赤卫队和人民群众背粮食，放警戒，修工事，削竹钉，协助红军进行战斗准备。黄洋界阵地前插满了竹钉。

8 月 30 日晨，湘军第 8 军第 1 师在炮火掩护下，向位于井冈山主峰北侧、通往宁冈要道的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进攻。黄洋界，又称望洋界、汪洋界，是茨坪通往宁冈、永新进入井冈山的通道，重峦叠嶂，地势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严阵以待的红军第 31 团第 1 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凭险据守，沉着应战，用轻武器和石块，打退湘军多次猛烈进攻，阵地岿然不动。湘军因受地形限制，无法发挥优势，遭受重创。激战至当日近黄昏，红军以仅有的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轰击湘军在源头集结的部队，湘军以为红军主力回山，畏于被歼，不敢再战，乘夜向酃县遁去。

此次战斗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基地，为打破国民党军“会剿”、恢复井冈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率红 4 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后，欣作《西江月·井冈山》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热情地歌颂了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井冈山和黄洋界由于此词，更加驰名中外。

武夷山中号角鸣

1928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临时省委“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割据局面”。4 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派陈昭礼到崇安巡视工作，并在崇安党团联席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崇安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关于加强武装斗争和“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吸取弋横农民起义的经验，在领导农民抗租抗债的基础上，建立了秘密农民武装，为起义作了准备。

9 月 28 日，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带领农民武装，惩办了劣绅陈光盛。10 月 1 日，中共崇安县委在东北乡领导农民数千人起义。接着崇安北乡农民揭竿响应，起义区域纵横达百余里。农民武装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受到重大损失，徐履峻牺牲，小部分武装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12 月 23 日，中共崇安县委领导农民再次起义，攻打下黄告捷。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由起义武装组成的游击队，在崇安以东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扩大到浦城、建阳等地，同赣东苏区红军的斗争夹信江相互呼应，声势较大。1930 年 1 月，闽北游击武装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团，陈耿任团长，很快发展到 1200 余人。5 月，成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府。

闽北农民起义，建立了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政权，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兵

力，配合了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商南起义燃星火

早在 1928 年 2 月，中共河南商城县委即派人到商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并成立了中共商南区委（亦称南邑区委）。5 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南五县特委把发动商南农民暴动，先实现商、固割据，再联合湖北黄安、罗田暴动势力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中共商南区委派漆德玮、周维炯、赵瑞祥等打入民团，组织兄弟会，发展共产党员。1929 年 3 月，中共商南党组织划归鄂东特委领导后，中共鄂东特委曾派红 11 军长兼第 31 师师长吴光浩（途中牺牲）、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南，组成了商（商南）罗（罗田北部）麻（麻城东北部）特别区委，负责组织领导商南起义。

5 月 2 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决定迅速发动武装起义。5 月 6 日，在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下，商南农民起义开始。隐蔽于国民党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团结部分进步团丁，同党领导的秘密农民武装一起，解除了丁家埠、李家集、吴家店、白沙河等地部分民团的武装，迅速控制了商南的和区与乐区。起义武装，建立了革命政权，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等口号，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9 日，起义武装在南溪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辖第 77、第 98 团，共 100 余人。

红军第 32 师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先后消灭了李家集、南滨等地的民团残余武装，打退了商城民团的进攻，给予双河、赵家河等民团以沉重打击，并占领了安徽六安县的金家寨，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争取了国民党军 1 个连起义，组成了第 100 团。6 月中旬，商南地区和红军第 32 师划归重建的中共商城县委领导。此后，红军第 32 师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部队发展到 300 多人，初步建成了以南溪和吴家店为中心的纵横各六七十里的豫东南苏区。

商南农民起义所建立的红军和苏区，给苦难深重的当地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予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一定打击，为尔后红军的发展和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川东诞生游击队

1929 年 5 月，在中共达县、宣汉地区组织领导下，共产党员李家俊等在万源固军坝发动的武装起义，是发生在四川省一次影响较大的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川东宣汉、万源地区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从外地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到 1928 年，形成了以王维舟、李家俊、雷玉书、唐伯壮、吴会治、张鹏翥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在群众中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团防武装，建立和掌握军事力量。决心利用固军坝山高林密，敌人力量薄弱的有利条件发动武装起义。

同年春，成立了起义指挥部，李家俊任总指挥，雷玉书任副总指挥，唐伯壮任政治委员，负责起义组织领导工作。4 月 27 日，唐伯壮、雷玉书等带

领由宣汉、达县、大竹等地的革命骨干 80 余人，分两路进至万源龙潭河地区同当地革命武装会合。5 月 7 日，在干坝子截获万源县府委员张全五，将其所携税款 400 块银元没收。刘存厚驻万源的川陕边防军第 3 团团长刘志超闻讯，派一个连赶赴白羊庙缉查。李家俊等即调各地农军于 5 月 12 日夜，从井溪、旧院、固军坝等地分路袭击该敌。敌人措手不及，迅即溃散。农军首战获胜，缴枪 50 余支。副总指挥雷玉书牺牲。不久，唐伯壮在达县被捕遇害。

白羊庙一战，敌人大为惊恐，刘存厚急调团长廖雨辰代理第 3 路司令，统一指挥刘志超等 3 个团，赶赴万源镇压起义军。李家俊等率起义军英勇还击。经过五爪垭反击战、白沙河奇袭战和夜战白羊庙等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刘存厚又加派第 2 师吴占荣团从宣汉方向对固军坝、井溪坝等地围攻。龙潭河一战，敌人损失惨重，围攻又被打破。

1929 年冬，中共四川省委派文强（化名李哲生）和王国梁到龙潭河加强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李家俊任总指挥，文强任党代表。这时，起义军 2000 余人，游击根据地发展到城口、宣汉、万源 3 县边境，面积约 1500 平方公里，人口达 5 万以上。1930 年 1 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 1 路游击队。3 月，刘存厚调集重兵对起义军开始全面“会剿”。敌军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等办法，先后攻占固军坝、白羊、井溪等地。起义军几次集中兵力实施反击，但因战术不当，补给困难，接连受挫。后来，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虽经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势单力薄，遭到重创。李家俊面对险恶的环境，决定分兵突围，掩埋武器，保存实力，待机再起。固军坝起义，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四川地区起义中是少有的。其斗争实践和经验，对尔后川东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高张义旗起遂蓬

遂蓬边界起义，是发生在四川省规模较大且有影响的国民党军起义。川军第 28 军江防军第 7 混成旅，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兵运工作的重点。该部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26 年，共产党员旷继勋任该旅第 2 团团长。中共川西特委为加强党在该旅的工作，先后派去一些党员，组成党的领导核心旅委会。团、营、连中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多由共产党担任。

1929 年夏初，该旅驻遂宁北面的射洪嘴（今永兴），由旷继勋代理旅长，加强对官兵进行革命教育。全旅上下，对军阀间的战争和他们鱼肉百姓、欺压士兵的行为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引起邓锡侯等人的注意，曾多次打算对这支部队进行“肃整”。旷继勋识破敌人的阴谋，拒不执行。不久，全旅粮饷停发，官兵生活困难，群情思变。该旅面对严峻形势，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中共四川省委为加强对起义的领导，派邹进贤、罗世文到该旅工作。邹、罗到达部队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制定了起义计划，成立了党的特委会，邹进贤任书记。起义军由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王金辂任参谋长。同时组成以邹进贤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6 月 29 日，部队以“打野外”为名，向遂宁、蓬溪交界的牛角沟移动。到达该地后，旷继勋向全体官兵作动员，宣布起义，打出四川红军第 1 路的旗帜。全旅 3000 余人，编为两个师，一个先遣队。红 1 师师长傅介藩，党代

表刘曼；红 2 师师长马之骥，党代表廖宗泽。起义军向蓬溪城进发，击溃李家钰 1 个骑兵团，攻入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李家钰得知蓬溪城失守，急从遂宁调两个团前去“进剿”。起义军遂向西充转移。尔后，起义军经南部、营山、渠县、达县到达梁山（今梁平）县境，原打算在该县猫儿寨作短暂休整，再徐图发展。当部队抵近该寨时，寨内中共党组织已遭破坏，由于缺乏内应，起义军两次进攻受挫，损失严重，加之人困马乏，再战不利。起义军被迫撤退，进至开江马安峡槽沟，被敌人重兵包围，大部溃散。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旷继勋和多数骨干离开四川，少数党员干部分散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继续开展兵运工作。

这次起义，虽然在敌人的进攻下遭到失败，但是一度建立了革命政权，在较大的范围内转战，发动了群众，保存了部分骨干，并为尔后川陕苏区的建立及国民党一些部队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皖水流域红一角

1929 年冬，发生在安徽西部六安、霍山、霍丘等地的农民起义，曾为红军的发展和苏区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后，该地的党组织秘密地领导农会、赤卫军和少先队等群众组织的活动，积极为农民起义准备条件。到起义发动前，仅六安、霍山两县农会会员便发展到 5000 人，编成了数支游击队，拥有 100 余支枪。同时，两县西部的群众武装“大刀会”中的基本群众已为党所掌握。

11 月 8 日，六安地区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首先高举义旗，在击溃敌人进攻后，控制了独山镇。接着，六安县的金家寨等地及霍山县的漫水河地区的农民亦相继起义，分别组成游击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霍山农协会员在红军第 32 师的配合下，攻克了一些村镇，打垮了反动武装，捣毁了西镇事务所。从 11 月下旬起，驻六安、霍山的国民党军独立第 1 旅向起义武装进攻，疯狂地屠杀人民群众，摧残革命力量。为了保卫起义的成果，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于 1930 年 1 月，将各区的起义武装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33 师，徐百川任师长，共 200 余人。

在六霍农民起义的推动下，潜山县清水寨（今属岳西县）的农民群众于 1930 年 2 月 2 日起义，组成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王小亭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共 100 余人。4 月，英山、霍山和六安等地的农民纷纷起义，组成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古田曙光照新军

1929 年 12 月下旬，中共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一个四山环抱的古田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了红 4 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 11 人，组成新的红 4 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若干决议案组成。其主要内容为：

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的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

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应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应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红军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领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并且规定了这两个部门的职权范围。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其阶级觉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并提出了政治训练的具体内容及方法。

阐明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高低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反对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还提出，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的要求，以及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是红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会议的决议，在总结建军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不但在红 4 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各地红军也都仿效并照着做了，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面貌一新的真正人民军队。

西南边陲旌旗卷

广西位于祖国中南部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属于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阶级矛盾尖锐，民性剽悍，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投身革命。大革命时期，广西的工农运动曾相当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等，继续领导农军在红水河和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在恩奉、果德、向都、那马接连爆发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起义，东兰、凤山两县农民自卫军一直开展武装斗争。1929 年夏，蒋介石打败桂系军阀后，任命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俞、李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就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后，希望同共产党合作以巩固其地位。应俞作柏、李明瑞的要求，党中央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并派张云逸等到广西，同俞、李建立了合作关系。张云逸担任了广西警备第 4 大队长和教导纵队副主任，俞作豫担任了警备第 5 大队长，有些共产党人也担任了基层的军官。9 月上旬，中共广西省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决定建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将广西省委改组为中共广西特别委员会，雷经天任书记。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得以恢复和发展。

9 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宣布反对蒋介石。10 月初，俞、李因部下被蒋收买倒戈而失败，俞出走香港，李率警备第 5 大队撤往龙州。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及广西特委即率领党所掌握的警备第 4 大队、教导队等近 2000 人，由南宁撤向右江，同该区工农运动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当到达百色、恩隆（今田东县）地区后，于 10 月 28 日解除了驻在该地的警备第 3 大队的武装，接着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武器，控制各县。邓小平布置了右江起义的工作后，于 11 月上旬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经龙州时又布置了左江起义的工作。为了策应百色起义，韦拔群于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两县农民 1000 余人，攻克太平和武篆区以及东兰县城，为百色起义创造了条件。

12 月 11 日，广西警备第 4 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辖 3 个纵队，共 2800 余人。12 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此后右江地区开始分配土地，相继建立了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 10 多个县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编为赤卫军。右江苏区初步形成。

1930 年 2 月 1 日，广西警备第 5 大队在龙州宣布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8 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辖 2 个纵队，共 1000 余人；李明瑞任第 7、第 8 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久，法国殖民主义扬言要干涉左江地区的革命，并派飞机入侵挑衅，受到左江地区革命军民的抗议，击落其飞机 1 架。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社论，称赞左江地区军民的斗争“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不久，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 7、红 8 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决定停止进攻。红 7 军未及执行，即连遭失利，被迫撤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苏区腹地东兰、凤山转移。这时，红 8 军在敌人的进攻下大部损失，一部转至右江后编入红 7 军。俞作豫被捕，英勇就义。红 7 军退到东兰、凤山后，为避开敌人进攻和解决给养问题，军部率第 1、第 2 纵队离开苏区向东游击，留第 3 纵队在东兰、凤山坚持斗争。红 7 军主

力转战桂黔边，一度袭占贵州省榕江县城，尔后回到右江苏区。在红 7 军主力离开右江期间，韦拔群领导的第 3 纵队和赤卫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作战，收复了三座县城，部分地恢复了右江苏区。此后，红 7 军进行了整编和补充，辖第 19、第 20、第 21 师，共 7000 余人。同年冬，第 21 师师长韦拔群、政治委员陈洪涛率 1 个连在右江苏区扩大武装，坚持斗争，红 7 军主力由河池出发，离开苏区，转战桂粤赣边境，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经湘赣苏区于 1931 年 7 月进至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时，红 7 军仅剩 1300 余人。留在右江地区的部队在危境中顽强坚持斗争至 1932 年 10 月，因韦拔群牺牲而失败。

左右江起义，在中南边远的地区建立了红军和苏区，坚持斗争两年多，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打击。红军在党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两次离开苏区长距离转战，进攻敌人的城镇，受到严重损失，但保留了一部分骨干力量。

武装割据遍赣南

1930 年 2 月 7 日，红 4 军前委，中共赣西特委和红 5、红 6 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陂头召开，在原“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任务。为统一赣西南地区的领导，决定将赣西特委与赣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3 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大会确定了“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等任务，正式成立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特委下设西河、东河、东路、中路、北路、西路 6 路行委。同时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5 月，成立了赣南暴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地起义。1930 年赣南各地的起义，多数是在“争取江西”战略计划指导下发动的。

1930 年春，在中共赣西南特委领导下，瑞金党组织先后在安治、武阳、黄柏、九堡、黄沙、仰山等地发动农民起义，成立了瑞金暴动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力量，攻打瑞金县城，实行全县总暴动。4 月 30 日，起义队伍 1200 余人攻占瑞金县城，活捉县长和“靖卫团”团总。接着，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6 月，组建了赣南红军第 24 纵队，400 余人，杨子光任司令员，鄢寰任政治委员。此后，农民起义遍布全县，有暴动队员 7000 余人。瑞金农民起义，为尔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色首都设在瑞金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赣南还发动了南康龙回农民起义，成立了南康县革命委员会，起义迅速波及到全县 20 多个乡，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南康县赤卫队后改编为赣南红军第 26 纵队。同年春夏之交，中共会昌党组织先后组织了晓龙、石门、莲石农民起义，保存了一些革命骨干，不断坚持斗争。

在赣南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迅速发展之际，于都县盘古山工农起义随之爆发。4 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 4 军抵达会昌城。活跃在盘古山由刘义顺领导的一支工农赤卫队，立即前往会昌，投奔红军。毛泽东、朱德在听取了赤卫队负责人的汇报后，红 4 军前委决定成立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 县边界特委，刘义顺任书记。同时决定在盘古山赤卫队基础上，成立赣南红军第 22 纵队，谢海波任纵队长，刘义顺任政治委员。毛泽东代表红 4 军前委指示 4 县边界特委，近期主要任务是组织工农起义，建立红色政权。中共 4 县边界特委遂决定起义，攻打盘古山地区国民党仁凤靖卫团和钨

砂局。4 月 23 日晚，盘古山工农武装发动起义，红军第 22 纵队和农民、矿工积极配合，迅速取得了胜利。起义武装打死国民党矿警 8 人，活捉土豪、山霸，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此后，红军第 22 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攻打了茶梓、龙布、桂林岗等地的国民党靖卫团。5 月底，在茶梓成立了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 县边区苏维埃政府。盘古工农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该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使这个地区成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5 月上旬，中共西河行委和上（犹）崇（义）县委,发动了以上犹县清湖镇为中心及其周围 12 个乡镇为起义点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在第 26 纵队配合下，予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上犹县革命委员会，各乡镇市相继成立了政权。9 月，驻守大余县新城的国民党军第 34 旅第 68 团 130 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彭加伦、高新胜领导下起义，加入红 22 军。

红 4 军前委提出“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虽未完全实现，但发生在赣南各地的武装起义，都为这一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作出了贡献。到 1930 年下半年，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 26 个县，初步与闽西、湘东南地区连成一片，为红军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宁都起义壮军威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蒋收编冯西北军第 5 路军为第 26 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就先后派共党人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魏野畴、邓希贤（邓小平）、王一飞等，到西北军工作并在西北军中建立了组织，有相当的革命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仍有少数共产党员继续留在该部坚持工作。1931 年春，第 26 路军由山东调至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留第 26 路军防守宁都，一直处在苏区人民群众和红军的包围之中，粮饷不继，疾病流行，军心不稳，士气低落，非战斗减员激增。

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予第 26 路军以深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该路军广大官兵不愿追随国民党继续打内战，要求回北方抗日，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和训斥，激起了爱国反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留在该路军中秘密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党组织，该部参谋长赵博生也经中共中央批准成为共产党员。同时，还在官兵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起义作准备。12 月上旬，中共特别支部得悉蒋介石下令逮捕第 26 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紧急情报后，遂同赵博生商定，乘该部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之机，举行起义，并将起义计划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中革军委批准了宁都起义计划。接着，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的固树圩进行联系与指导，命令红军第 4 军进至宁都、广昌之间地区，支援宁都起义。

12 月 14 日，第 26 路军约 1.7 万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等领导下，逮捕了抗拒起义的军官和宁都县县长，在宁都毅然起义，弃暗投明，加入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辖 3 个军：第 13 军，董振堂兼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

员；第 14 军，赵博生兼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 15 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

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一次大规模的国民党军成功的起义，使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生的力量和英勇善战的劲旅，有力地鼓舞了红军和人民的斗志，予国民党营垒以很大瓦解，沉重打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尔后的国民党部队起义树立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在起义中，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发展中坚、孤立少数、打击顽奸、大胆开展上层军官工作的经验，也为全国尔后的兵运工作和反蒋抗日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红军中的三个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

红一方面军，由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组成于 1930 年 8 月，曾称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直接领导创建较早的一支革命武装，是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湘南、闽西、赣西南、弋（阳）横（峰）、百色等起义诞生的武装力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战斗足迹遍及湘、鄂、赣、闽、浙、粤、桂、川、黔、滇、陕、甘、宁、晋等 15 个省区，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它历经了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的战斗历程。

1927 年 9 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途中的三湾改编，奠定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 月转战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砻市与毛泽东所部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后改称红军第 4 军）。同年 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组成的红 5 军主力由湘赣边转战到宁冈，同红 4 军会师。会师后，红 5 军编入红 4 军，红 5 军的另一部由黄公略领导仍留湘鄂赣边坚持武装斗争。这期间，红 4 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挫败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数次“进剿”和“会剿”，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 4 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与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12 月，红 4 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故又称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红 4 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的重要里程碑。此间，红 4 军在军事上接连粉碎了赣粤闽三省国民党的两次“会剿”，壮大了队伍。留守在井冈山地区的红 4 军一部与“会剿”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4 昼夜后遂向赣南转移，而后又重返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1930 年 6 月，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以红 4 军为骨干组成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以红 5 军为骨干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8 月，红一、红三军团会师后，共 3 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并组成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实现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开始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标志着红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9 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的三次大规模“围剿”，歼灭国民党军约 8 万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部队建设进一步发展，并在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红军作战方针原则。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所属部队归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同年 12 月，国民党第 26 路军 1.7 万余人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增强了红军力量。

1932 年 3 月，中革军委决定重编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并组建军团总指挥部。6 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方面军总司令由朱德兼任。8 月，红一方面军组织序列作了局部调整，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0 月，周恩来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年，红一方面军连续进行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黎泰和金资等战役。

1932 年，红一方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影响下，进行了 6 次进攻战役，有胜利也有挫折。次年 3 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继续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近 3 个师。此时，红一方面军已达 8 万余人。5 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5 月底至 6 月初，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编制进行改编。1933 年 9 月下旬，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0 月，组建红七、红八、红九军团。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一方面军苦战一年，终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进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湘江封锁线”后，红军由 8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6 月，与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8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张国焘拥兵自重，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红一方面军坚决执行北上方针。9 月，决定将北上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第 1、第 3 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夺占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主力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历时 1 年，纵横 11 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红军第十五军团加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1 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

的“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 年 2 至 7 月份，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开创了西北革命的新局面。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全部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1 月，三大主力红军同心协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1937 年 7 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 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共同抗日的协议，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15 师，开赴华北前线，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红军第 32 军组成于 1936 年 7 月，是贺龙、任弼时等直接领导创建起来的，先后转战湘西、鄂西、黔东、湘赣以及湘鄂赣等地区和苏区。

1930 年 7 月，湘西地区的红 4 军（后改称红 2 军）与鄂西地区的红 6 军会师后，在湖北省公安县城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次年初，红二军团缩编为红 3 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1934 年 5 月，红 3 军进入贵州省东部地区，开辟了黔东苏区。红六军团是由湘赣苏区的红军第 17 师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军第 18 师于 1933 年 6 月合编而成的。次年 8 月，从湘赣苏区遂川县出发，向湖南省中部转移，并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10 月，红六军团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地区与红 3 军会师。红 3 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军共 7700 余人，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会师后的红二、红六军团遂发起湘西攻势，相继攻克大庸、桑植、桃源等县城，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1 月，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和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革委会主席兼司令员。部队扩编后，两军团已达 1.1 万余人，地方武装也已发展到 3000 余人。

1935 年 2 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示，成立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贺龙任主席，统一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在半年时间内，红二、红六军团连取陈家河、桃子溪、忠堡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 80 余个团的“围剿”，共歼灭国民党军 2 个师、1 个师部又 1 个旅。9 月，国民党军又调集 130 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再次发动“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区的决定，红二、红六军团于 11 月除留 1 个师在苏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以 1.5 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主力部队南下湘中，攻占新化，后又转师湘南，西入贵州省，到达石阡地区。本打算在黔西再建苏区，并扩军 5000 余人，旋因国民党重兵追击，只得西进乌蒙山、辗转于彝良、奎香地区，后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防线，南出宣威，进入南北盘江地区。1936 年 3 月下旬，甩掉国民党军追兵后，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进入中甸。7 月，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地区会师。

会师后，奉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与红 32 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 月，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宁夏两省边界的将台堡、老君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此后，方面军政治委员由关向应担任。11 月，参加山城堡战役。12 月，西安事变后，南下参加准备迎击何应钦“讨伐军”的行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与红军第 27 军、第 28 军等部，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20 师，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红军第 4、红军第 25 军组成于 1931 年 11 月，是徐向前、张国焘等领导发展起来的，其战斗足迹遍及鄂、豫、皖、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从黄麻、商南、六霍起义起，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一支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发展为 8 万余人的正规军，创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在长征途中，有力地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历史，既是艰难曲折的，又是伟大光荣的。

1927 年 11 月至 1929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组成工农武装后改编为红军第 11 军，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0 年 4 月，红军第 11 军改编为红 1 军。6 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年底，红军第 15 军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转战到鄂豫皖苏区的黄（安）麻（城）地区。次年初，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后，红军第 1 军与红军第 15 军合编为红 4 军，共 1.25 万余人。1931 年 5 月，鄂豫皖苏区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7 月，红 4 军主力由豫南地区南下展开攻势作战。两个月时间歼灭国民党军近 7 个团。10 月，红军第 25 军在皖西组建。11 月初，红军第 4、红军第 25 军在湖北省黄安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 3 万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苏区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为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创造了条件。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机，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 4 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约 6 万人，使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开始，便告破产。潢光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总数已达 4.5 万余人。苏区扩大到 4 万余平方公里，拥有 26 个县的政权。

1932 年 7 月，蒋介石再次调集重兵，并亲任剿总司令，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军民虽英勇奋战，却终因张国焘的战略指挥错误和在苏区推行过“左”的政策，而未能打破国民党军 30 万之众的“围剿”。10 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 2 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西，于 11 月到达陕南地区。12 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1933 年 2 月中旬，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以近 6 万人的兵力进攻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转战 4 个多月，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歼灭国民党军 1.4 万余人。6 月底，红四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决定扩编整训部队。8～10 月，红四方面军利用川军部署未稳之机，发起了仪南、营渠、宣达 3 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 2 万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苏区，并壮大了队伍，其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约 8 万人。11 月，川军调集 20 万人的兵力向川陕苏区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奋战 10 个月，先后挫败川军的 4 次总攻，歼灭川军 8 万余人。1934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先后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制定了加强政治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军事教育计划，各部队开展整训，提高了战斗力。这期间，红四方面军还组建了一个 2000 余人的妇女独立团，直属方面军总部领导。该团与其他部队一道，转战南北，是红军中较早的妇女战斗部队之一。

1935 年 3、4 月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以实现“依据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并

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此时，张国焘畏惧困难及国民党军的攻势，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带领 10 万之众向西转移，开始长征。6 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会师。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向红四方面军抽调输送了一部分干部，而红四方面军则向红一方面军抽调了 3 个团，并划归其建制。8 月下旬，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两军共同北上途中，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包座战斗，打开了北进通道。但由于张国焘顽固对抗党的北上方针，并电令右路军南下川康边，党中央遂率红 1、红 3 军单独北上。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张国焘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与川军主力进行决战，使部队蒙受严重损失。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终于迫使其同意第二次北上，取消其自立的“ 中央 ”，并在甘孜地区接应了长征转战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团结一心，越草地、出甘南，并分别于 1936 年 10 月在甘肃省会宁城和静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长征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 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成立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与军阀马步芳部优势兵力进行了 4 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马部约 2 万人，但西路军也损失严重，战至 1937 年 3 月终于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部编为 3 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 400 余人，历尽艰辛，于 4 月底进入新疆，后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另 2 个支队大部牺牲，少数幸存者陆续返回陕北。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 2 个军共 1.1 万余人，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后遂参加了支援西路军的援西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率部由陕西省淳化地区西进，途中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1937 年 7 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第 4、第 31 军和陕北红军第 29、第 30 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29 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在 10 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历经艰苦奋战，不仅歼灭了数十万国民党军，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总结积累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建军及作战经验，而且还造就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